

山东师范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基督教女传教士在山东活动述论(1860-1920)

---

姓名: 朱小俐

---

申请学位级别: 硕士

---

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

---

指导教师: 李宏生

---

2001. 4. 29

## 中文摘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新教各差会纷纷涌入山东,到1920年前后,山东的女性传教士的数目已远远超过男性传教士,二者的比例为3:2。本文将从以下五部分对基督教女传教士在近代山东的活动及其特点、贡献及历史局限性做详细论述。

一、基督教女传教士来华的时代背景。该部分先从国际背景着手分析,指出殖民主义与福音奋兴运动是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兴盛的根源和推动力,而西方基督教女子社会改革运动为女性赴海外传教扫清了障碍;在国内,清末民初的中央和山东地方政府对基督教都采取“宽容”政策和较友好的态度,而为方便在山东广大妇女中开展传教活动则直接需要大批女传教士来山东工作。

二、基督教女传教士来华的身份构成及目的。此部分主要讲述基督教女传教士来华的数量、所占比例、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和目的。

三、基督教女传教士在山东的活动。本文在这一部分中共介绍了女传士的布道、教育、医疗、著述四种主要活动。在布道活动中,除概括介绍布道的形式、对象、手段、成果及地位外,还详细介绍了妇女圣经班和美国南浸信会的慕拉蒂其颇具影响力的布道思想;在教育活动中,介绍了普通教育的概况,还着重介绍了在全国差会系统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启暗教育和实业教育;在医疗活动中,先从女传教士从事医疗活动的起因和发展概况入手,继而还介绍了女传教士从事的医学教育,尤其是为近代山东创立了最早的专业护士教育;在著述活动中,除了可以了解到女传教士著述活动的大体情况外,还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倪维思夫人的著述活动进行了单独的介绍。

四、女传教士的活动对近代山东社会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女传教士兴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女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山东妇女起到启蒙的作用,并倡近代山东改良新风,反对缠足、弃婴、一夫多妻等社会陋习,支持了妇女反封建压迫。但女传教士所提倡的女学和女性解放为自身的教义和人类历史进程所

局限,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广大山东妇女摆脱封建压迫。

五、女传教士在山东活动的特点。其一,女传教士在活动中表现出对山东、山东人民态度的两重性。一方面,广大女传教士表现出对山东、山东人民无比的热爱,另一方面,自身的文化沙文主义又使一部分女传教士脱离了广大山东民众。其二,女传教士组织了相对完善的妇女工作。

关键词: 女传教士 基督教 近代山东社会

##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the western Protestant missions landed Shantung in succession. Around 1920, the number of female missionary had surpassed greatly the number of male missionary in Shantung, the ratio was 3 to 2. This thesis would discuss the female missionary's activities, features of activities, contribution to Shantung and limitation.

The first part talks abou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ich female missionary came to China. Colonialism and Gospel Promoting Movement were the source and promotion of the modern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s prosperity. The western Christianity female reform movement cleared the obstacles for overseas preaching.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ll comparatively took tolerant policy and friendly attitude towards Christianity. For convenience's sake, missions wanted a large number of female missionaries to take up woman's work among women in Shantung.

The second part deals with the number, the ratio, the family backgrounds, lever of education and the aims of female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The third part states the female missionary's activities of preaching, education, medical work and literature. In the part of preaching, this thesis briefly talks about the form, object, means, achievement, position of preaching, and speak in detail the Bible training education for woman and the thought of preaching of Lottie Moon. In the part of education,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typical case——education for deaf and industrial education, besid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part of medical work, this thesis stat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medical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first professional nursing education. In the part of literature, this thesis talks about mainly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Mrs. Nevius's activity of literature.

In this part, the thesis points that female missionary founded the first education for girls, enlighten the women of Shantung to some extent. Female mission-

ary advocated the improvement in modern Shantung, opposed foot – binding, foundling, and so on.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religious doctrine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of mankind, the female missionary proposed the female Liberation and education for girls which couldn't let women get rid of feudal oppression.

In the last part, the thesis analyses the features of female missionary's activity. First, female missionary expressed the dual nature of attitude towards Shantung, the people of Shantung. On the one hand, they loved Shantung, the people of Shantung very much,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cultural chauvinism separated themselves from the people of Shantung. Secondly, they organized relatively perfect woman's work.

**Key Words:** Female missionary Protestant The modern society of Shantung

## 导 言

传教士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的课题。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担当了文化传播与文化渗透的双重角色,对于这种复杂的群体,完全有必要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得出其活动的规律。长久以来,学术界所研究的传教士中,男性占了绝对的比例,女传教士似乎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群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中华归主》统计,1920年前后,山东省男、女传教士比例为2:3。女传教士人数的增多和所占比例的增长,反映了山东基督教妇女布道工作的发展及女性在教会各项事业所占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女传教士在近代山东社会的活动及产生的影响,值得投入力量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国内学术界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有关传教士问题的必读之作,但其中并没涉及女传教士的研究;陶飞亚、刘天路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从区域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女传教士的活动有所涉及;段琦的《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及影响》是国内少有的一篇专门研究女传教士的文章。相对于国内研究的薄弱,一些国外学者写出了极有见地的著作,如贝奈特的《南美以美会妇女在华的传教工作》、J·亨特的《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又名《女性的福音》)、葛佩兰的《中国妇女和基督教(1860-1927)》等,但这些著作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去看待、分析女传教士的活动,评价难免有些偏颇。

本文试从性别研究,即女性传教士的角度切入近代山东社会,立足于区域分析,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重新审视一系列历史事件背后其人性或非人性的动机,以其突破传统设置的判断尺度,给予女传教士更客观、公正的评价。只有全面、完整地研究历史上的传教士群体,认清山东社会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才能把握现在与未来,才会深刻理解党的宗教政策,这对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文化体系有积极的意义。本文的“性别”不仅仅是指代妇女的名词,而是以“人”为对象去“分析一个民族、一种传统、一段历史”的方法,这在国际学术界也十分热门。由于资料分散,难以尽集,而且涉及这一研究领域者寥寥无几,几无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加之本人学

识有限,不足之处,敬请师长指正。

另及,基督教在广义上包括罗马公教(我国称天主教)、正教和新教。我国把新教各派称为“基督教”和“耶稣教”,本文“基督教”指狭义的含义,即专指新教各派。女传教士则泛指新教各派来山东从事布道、教育、医疗等各项活动的女性。

## 一、基督教女传教士来华的时代背景

### (一)国际背景

#### 1、殖民主义与近代基督教传教活动

“近代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兴盛根源于殖民主义。”<sup>〔1〕</sup>16世纪以来,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天生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对原始积累的渴求,将新兴资产阶级推向海外殖民,于是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广阔土地上,上演了西方列强“血与火”的殖民史。“作为具有强烈普世意识和‘拯救’全人类愿望的宗教意识形态,基督教成为殖民主义手中扩张的工具,神圣的十字架染上一层厚厚的殖民主义毒素。”<sup>〔2〕</sup>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的序幕。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荷兰、法国及英国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两大殖民帝国的地位,英国又从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中胜出,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英国殖民者在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保证下,其在东方的扩张更具侵略性,18世纪末,在海外殖民活动和国内宗教复兴运动的共同影响下,英国出现了一股赴海外,特别是远东传教的热潮。1807年,英国伦敦会最先派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在另一传教活动的主力国家——美国,宗教主义者用“天定命运论”做为号召大批教俗人士进行海外殖民的神圣动力。美国宗教思想家乔塞·斯特朗诡称,“美国基督教及其民主机构和制度的扩展,将把世界带进一个完美的千年王国,美国是上帝复兴世界的代理者”。<sup>〔3〕</sup>在这一蛊惑下,新教各教派在内战结束后不久,如雨后春笋般组建起不少海外差会,活跃于亚洲、非

〔1〕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2〕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页。

〔3〕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洲等地区。1830年,受派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揭开了美国对华传教活动的序幕。

在近代殖民主义浪潮中,军舰、商旗与十字架相依相随,充分表露了基督教与殖民主义的合流。西方殖民者将野蛮扩张的行径“罩上神圣的光环”,掩饰其“卑下的私欲”。海外殖民掠夺积聚的巨额财富使他们世俗扩张的欲望不断膨胀,从另一方面也推动着基督教征服世界的进程。基督教在文化传播和宗教扩张方面的热情,“可谓诸教之冠”。19世纪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差会纷纷加入海外传教的队伍,因此,19世纪被欧美史学界称为“新教扩张的世纪,”也是基督教“在全球叱咤风云的时代”。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女传教士进入中国。

## 2、福音奋兴与近代基督教传教活动

19世纪,基督教的基本原则遭到广泛流行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批判与冲击;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使人们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宗教对真理的特权被人置于脑后”;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在充分显示人类创造力的同时,也有助形成一种漠视宗教的氛围。一些宗教人士面对基督教势力的衰落,决心通过福音复兴运动,激发“活跃的灵性的热诚”,以图重振教会的权威。18世纪30至40年代,卫斯理兄弟与怀特菲尔德这三大领袖发起的福音奋兴运动,不但激发起人们对宗教的热情,而且对英国以外的欧美国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18世纪末,旨在复兴基督教福音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美国兴起。

被誉为“近代宗教复兴精神之父”的查尔斯·芬尼宣扬的“至善论”“推翻了加尔文的预定论,大大唤起了人们的宗教热情,并论证了异教徒获得拯救的可能性,为传教运动提供了神学上的依据。”<sup>〔1〕</sup>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英美基督教中流行一种千禧年思想,“在基督第二次降临地球以前,福音必须被传遍全球”,从而传教成了越来越迫切的任务。如果能有途径进到有数千年文化的中国传教,他们更觉迫不及待。

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社会分裂使宗教复兴运动逐渐沉寂,也大大削弱了人们海外传教的热情。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宗教复兴运

---

〔1〕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动又一次在美国兴起”。<sup>〔1〕</sup> 1888年7月,“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正式发端,也掀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浪潮。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男女毕业生,在文化水平和修养方面普遍高于早期的传教士,大都有虔诚的信仰和宗教献身精神。富有活力的大学生将拯救异教徒看作具有冒险性和刺激性的一项事业,而古老的中国成为巨大的磁石,吸引他们的视线,并随之成为到中国宣教的主力军。“从1886年至1919年,共有8140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国外传教,其中2524人前往中国。”<sup>〔2〕</sup>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不少到山东的女传教士就拥有文学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的高等学位。

“福音奋兴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近代新教传教事业的兴起。”<sup>〔3〕</sup> 各教派将传教运动做为延续国内宗教热情和教会健康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海外传教事业的兴旺,为妇女参与教会工作提供了广阔天地。由于在中国复杂的传教环境中,许多工作,特别是医药、教育等,已超出一般传教士的能力,故各教会选派传教士的观念有了变化,“越来越多没有神职的专门人才被录用去承担技术和教育方面的传教工作”,<sup>〔4〕</sup> 许多女性的教师、护士开始获得传教士的身份,从而踏上去海外传教的旅途。

### 3、西方基督教女子社会改革运动

自古西方妇女一直处于受压制和歧视的地位,她们被囿于“家”的范围中,“政治上无选举权,法律上受歧视,经济上受剥削,文化教育上被剥夺权利”,<sup>〔5〕</sup> 是其真实写照。这种卑微的处境延续到阶级社会的人为宗教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及有关性歧视的法规充斥在教义中,基督教也不例外的将女子视为二等公民。“在教会里,一切基督徒皆为兄弟姐妹的美妙宣言,事实上仅仅限于尽义务而已。至于参事权,特别是圣职任命,与女子根本无缘”。<sup>〔6〕</sup> 妇

〔1〕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2〕 Clifton J. Phillips,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s, 1886 - 1920”, J.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05.

〔3〕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95页。

〔4〕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5〕 [美]J·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下),第一分册,戴瑞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1页。

〔6〕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7页。

女在教会内部和各种慈善团体中,从事繁重的服务性劳动,负责捐款、义卖活动,护理病人,帮助穷人,照料孤儿,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但依然无法改变现状。面对奉献与回报的巨大反差,终于一些勇敢、有觉悟的基督教女性向上帝发出抗争的呐喊。她们要挣脱千百年来“原罪”祸首的沉重枷锁,“冲击以男性为主宰的教会结构和社会秩序。”19世纪在美国开始的以男女平权为焦点的女权运动,尤其具有代表性。

女权运动的领导人,大多是虔诚的基督徒,有5位长老宗女会员,在美国内战前期的基督教女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充当了开拓的先锋。她们用《圣经》作为抨击父权制和男子对圣职垄断的武器,鼓吹人人平等、信徒皆为牧师。其中,路易莎·A·路丽做为美国早期的女性海外传教士,“她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变革机构,传教活动尤能提高妇女的地位,”<sup>〔1〕</sup>坚决主张在圣职任命和传教方面男女平权。

美国的女权运动经历了艰辛的进程,直到内战的爆发,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难怪护士先驱克拉拉·巴顿声称,“要不是战争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她们也许比当时还要落后五十年”。<sup>〔2〕</sup>由于战争,许多男性专属的工作不得不向妇女开放,更多的女性加入拥军协会等服务组织,并逐渐在教会中构成了主体成份,女性对教会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日趋显现出来。

除传教、慈善事业外,在社会改良方面,教俗界的妇女共同为公共禁酒法案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并将努力的方向延伸到政治和其他领域。诸如:1874年成立的“基督教女禁酒协会”;在犯人教养、教育、净化运动、劳工条件和女权方面提出的改革方案等。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传教领域。内战之前,只有女子同男传教士结婚后,充当“传教助手”,才可获准赴海外传教。而女性在基督教社会改革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创造能力和组织能力”丝毫不逊于男子,“教会人士也被迫承认,女子的宗教感情、直觉、纯洁性和悟性均超过男子。”<sup>〔3〕</sup>到1890年,美国34个妇女团体赞助支持世界各地926位传教士的工作……随着这些妇女团体开始拥有发言权,1900年后,男性教会领袖极不情愿地派出单身女性到海

〔1〕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2〕 [美]J·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上),杨国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93页。

〔3〕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

外传教,妇女团体也被吸收进教派机构中。<sup>[1]</sup>1868-1912年间,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宗派都成立了女子海外差会,派出单身女传教士200万名。<sup>[2]</sup>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为何来华美国女传教士居各国之首。

## (二)国内背景

### 1.清末民初中央对基督教的态度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实行自康熙、雍正以来的严厉的禁教政策。新教传教士因受制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只能在秘密状态下从事传教工作,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港澳地区和广州、福州等少数几个口岸城市。至1840年,传教士仅为20人,信徒不足百人。鸦片战争的惨败,使道光帝迫于压力,于1845年2月发布上谕,弛禁天主教。这一时期,传教士活动范围仅限于通商口岸,传教活动也受到清政府一定程度的限制,形成所谓“限教政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全面洞开,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全境自由传教的特权。限教政策被宗教宽容政策所取代”。<sup>[3]</sup>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分别同各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在这些条约里,由于传教士的参与策划,全部塞进了容许在中国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sup>[4]</sup>以“法理的形式”固定下来。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规定:“天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sup>[5]</sup>到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对于各国在天津条约中所获传教的权利,除再予肯定外,并予以进一步的扩充”,<sup>[6]</sup>又规定了传教士可以到内地活动的条款。

清政府对传教活动表面上“悉遵成约”,暗地里则建立规章制度约束传教士的行为,防止教案的频繁发生。1871年6月,总理衙门向各国驻华使馆提出《商办传教条款》即《传教章程》共八条,其中一条为“各教堂内凡中国妇女概

---

[1] Rabe. Valentin H.: 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s 1880-192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0.

[2]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213页。

[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63页。

[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5页。

[6] 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0年,第38页。

不准入堂,即外国修女们亦不准为中国传教。”<sup>〔1〕</sup>因此章程遭到各国的一致反对,并且主要针对天主教传教士,故对新教女传教士的活动并未起到多少阻碍作用。“由于中外势力对比的悬殊和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清政府不可能控制教士的行为”,<sup>〔2〕</sup>清政府与各列强之间,中国官民与各国传教士之间,各省平民与教民之间连生冲突,教案不断。晚清政府对基督教采取的宽容政策也必然带有弱国外交的色彩。

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更开放的政策。”<sup>〔3〕</sup>孙中山颁发的《对外宣言》、《临时约法》即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为防止教会对中国政局的干涉,孙中山提倡在中国实行“政教分离”。他还在1912年3月致函教友康德黎夫人时指出:“我们正在谋求中国实行宗教自由,而在此制度下基督教必将昌隆繁盛。”<sup>〔4〕</sup>在这种氛围下,基督教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

## 2、清末民初山东官方对基督教的态度

山东濒临黄海、渤海,“控制北洋门户”,登州为清政府军事重地,登州以东的烟台,为山东半岛北岸的最大商埠,后被青岛所取代,就地理位置而论,山东为沿海要区,承守西方文化的冲击既早且巨。<sup>〔5〕</sup>山东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又因是集儒家之大成的孔孟之故里,而被称为“中国之圣省”。英国传教士阿姆斯特朗(Alex·Armstrong)在其《山东》一书的序文中指出:“山东为中国史中最有兴趣、最可纪念诸省之一”。<sup>〔6〕</sup>这就决定了近代山东“既是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扩张的战略要地,也是西方基督教会开展宗教活动、发展教会势力的重点区域。”<sup>〔7〕</sup>1858年《天津条约》将登州辟为通商口岸(后改为烟台),1859年5月,以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花雅各夫妇(Mr. and Mrs. Holnus)登陆烟台为起点,西方新教各差会纷纷涌入山东。花雅各夫人也成为第

〔1〕 李刚己:《教务纪略》,卷三下,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2〕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

〔3〕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4〕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1页,中华书局,1982年。

〔5〕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3页。

〔6〕 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甲编),第一部分:导言,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1939年。

〔7〕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页。

一位进入山东的女性传教士。

从1860年到1900年3月袁世凯之前的13位山东巡抚大都出身科举,他们浸润于经典诗书既深,对洋教十分反感。其中,李秉衡、张汝梅皆因教会问题被清政府革职。做为“昧于外交大势又极端仇教、既有强烈的民族义愤又守旧愚昧的顽固官僚的一个典型”<sup>〔1〕</sup>——毓贤,因山东各差会不满其赞助义和团,被公然点名要求下台。1899年12月,毓贤被解职,调离山东。1900年3月,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山东官方与天主教势如水火,矛盾相当尖锐,而与新教之间虽有对抗,但相对于天主教来说关系则比较缓和。

袁世凯出身淮军,曾任驻朝鲜商务监督,后起的洋务官僚。他上任后立即残酷镇压拳民,“下令地方官员处理民教争端,必须做到‘不积压,不逾夜,洋人自不得而挟持之’”,<sup>〔2〕</sup>民教争端渐趋缓和。1901年,袁世凯聘请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协助开办山东大学堂,以此为标志山东官府和基督教会之间首次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袁世凯之后的几位继任巡抚,也大多与教会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1911年4月,在济南医学院竣工的典礼上,“山东巡抚孙宝琦和其他贵宾出席了这一仪式。次日,这些贵宾的夫人出席了由传教士女眷们举行的招待会”。<sup>〔3〕</sup>1911年圣诞节,孙宝琦与清海军司令萨镇冰及外国宾客在医学院传教士聂惠东夫妇(Dr and Mrs. J. B. Neal)家中,共进圣诞晚宴。<sup>〔4〕</sup>这表明教会的地位也被山东官方所承认。

清王朝崩溃后,山东政界官员与教会的友好态势也延伸到民初的山东社会。在教会举办的活动中,也时常有政界人物的身影,再加上军阀混战无暇顾及教会问题,使新教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 3、近代山东传教活动对女传教士的需要

女性在宗教生活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热情和虔诚,比男性更易受上帝的召唤,有着崇高的奉献精神。西方传教士也因此把在山东妇女中扩大耶

〔1〕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3页。

〔2〕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3〕 郭查理著:《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4〕 John J. Heeren: On the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New York, 1940, P. 145.

稣的影响、发展信徒做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开展。中国“素以名节廉耻为重”，历来讲“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大防”，民众认为传教士“开堂传教，男女兼收，嫌疑所在，众情难堪！”这必然会给男性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带来障碍。为方便在广大山东妇女中开展工作，适应山东的封建传统，派遣女传教士和女传教团体进入山东，设立妇女布道站，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传教士的布道工作通常需要走家串户、深入家庭去宣讲福音，男性传教士往往因为“男女有别”的封建观念而丧失走进平民家庭的机会。而这时女性传教士在性别上的优势突现出来，她们接近民众的生活，消除人们尤其是山东妇女的忧虑和戒心。女性传教士可以站在相似姐妹的立场去赋予处境悲惨的中国妇女以同情和关注，可以根据同性的心理体验，采取行之有效的传教方法，尽可能多的发展女教徒。当医疗工作成为重要的传教辅助手段时，男医生不能正常在妇女中开展工作，因为山东妇女极不愿意让男性检查，而这一机会再次向女传教士敞开大门。一位美国教会历史学家指出：“正是由于东方这种特殊的性别障碍，妇女工作才更易取得比在美国国内显著的成果。”<sup>〔1〕</sup>美国女传教士们发现，中国社会的“男女有别”对他们是有利的，她们可以独自享有开创和圆满完成一项工作的荣誉感。<sup>〔2〕</sup>

早期山东传教士尽管采取“男女分座、男女隔离”等方法来解决传教中“性别障碍”的现实问题，但在山东这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土地上，所收到的效果自然十分有限。1891年，英国浸礼会在山东的格洛弗(Glover)博士就强烈要求伦敦的浸礼会女布道会委员会派出单身女士，到浸礼会山东领域的妇女和姑娘们中间去工作。<sup>〔3〕</sup>女传教士因传教工作的需要来到山东，为各差会妇女工作的繁荣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在国际、国内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在主观、客观条件的作用下，大批女传教

---

〔1〕 Ellen C. Parsons, "History of Organized Missionary Work as Presented by American Women"转引自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 American Woma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

〔2〕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 American Woma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

〔3〕 柯克兰德:《山东(英国)浸礼会女布道会史略》郭大松译,出自法恩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第39页。

士远涉重洋,登陆山东,其活动产生着对近代山东社会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 二、基督教女传教士来华的身份构成及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基督教女传教士人数有显著增长。1876年,女传教士只有407人,占传教士总数的49.8%,1905年则达到2002人,所占比例上升到58.1%,1920年复增至3919人,在性别比例上远远超过男传教士所占比例,达到63.2%。据《中华归主》1919~1920年统计,当时各国来华差会约130个,其中美国有65人,英国有35个。1920年在华外国传教士共6636人,其中美国在华的3305位传教士中,就有女性2104人,占其总数的2/3。这一时期,山东省布道区数目居全国第一,外国传教士504人,女传教士总数312人,其中又以美国女传教士的数量最多,全省男女传教士比例为2:3。基督教女传教士人数的增多和所占比例的增长,反映了山东乃至全国各差会对妇女传教工作的重视和女传教士地位的提高。

表1 近代来山东基督教女传教士人数及比例

年 份	男传教士人数	女传教士人数	传教士总数	女传教士所占比例
1893年	90	94	184	51%
1920年	192	312	504	62%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893年山东传教士第一次大会记录》综合整理而成。

来华的英、美基督教女传教士多出身于中产阶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她们的家庭一般都有信仰基督教的传统,重视对子女的宗教教育。在中国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女传教士有40%来自本国中西部地区,其中出身于传教士或牧师家庭者占40%,农民出身的占25%,极少有工人和富家子女。<sup>〔1〕</sup>出身于传教士或牧师家庭的女孩子从小就受到家庭浓厚的宗教氛围的影响;出身农

〔1〕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 American Woman Missionaries in Turn - of - the - century - Chih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8 - 29.

民家庭的女孩子从小就有崇尚自由、喜爱冒险的性格,她们自然而然就成为美国赴海外女传教士的主体。此外,来华女传教士中多数有过当教师的经历,或青少年时代参加过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志愿团体等组织的各种活动,培养起较强的独立工作的能力,具备了“强烈的宗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海外布道活动和学生志愿运动感召下毅然远涉重洋来华从事传教工作”。<sup>〔1〕</sup>

早期,来华女传教士多为中小学文化程度,随着传教事业的复杂化,对女传教士能力的要求也逐步提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教女传教士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早期。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许多大学相继取消了对女性的限制,女大学生毕业人数日渐增多。据1900年统计,是年美国大学毕业女生5237人。<sup>〔2〕</sup>恰逢此时学生志愿运动征召赴海外的传教士,众多大学男女青年积极报名参加。近代山东的各国女传教士文化水平在整体上低于男传教士,“但一般也都有社区学院(专科学院)的学历”。更有不少拥有高等学历的女传教士,如:美国南浸信会女传教士慕拉蒂(Lottie Moon)186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曾被誉当时“美国南方受过最好教育的妇女”;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梅理士的第二位夫人梅耐德(Annette Mills)曾是纽约州著名的罗切斯特(Rochester)启暗学校的首席教员;美国南浸信会卫灵女校的第三任校长浦爱德女士(Ida Pruitt)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美国长老会从1898年至1910年就有4名女医学博士到山东从事医疗工作。这些经过专门训练,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传教士的到来,使各差会的妇女传教工作更具专业化。

每位女传教选择来华传教的目的不同,原因也很复杂。1854年,一位妇女表达了成为传教士的浓厚兴趣,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女性之所以选择海外传教的共同心声:

“传教事业向妇女敞开了一个积极的、有作为的、充满个性的领域,这不是在现有社会组织下随处可见的。在这里,她可以展示她在精通无人知晓的、困难的土语方面的才能,可以展示在与形形色色性格的人打交道时的机智;可以展示在最沮丧情况下追求崇高目标的热情与坚韧;可以展示昂扬的基督教英

---

〔1〕 段琦:《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及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第33页。

〔2〕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70 Edition P659,转引自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载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雄主义和面临可怕的困难、甚至是死亡时的坚韧不拔”。〔1〕

对于众多女传教士来说,在中国传教的经验“代表着她们向独立和职业生涯迈进的一步”。她们渴望取得与男性同样的职业地位,不只是在教会里充当“助手”的角色,也不仅仅做一名“薪俸微薄,而且升迁渺茫”的小学教师。女传教士们认为,“赴海外传教,犹如拓荒探险,虽险犹荣,能得到社会的肯定,心理的补偿”,〔2〕还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尤其是不少单身女传教士对传教工作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有着更强烈的奉献精神和无畏的勇气。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女传教士选择来华只是为忠诚地履行为上帝征服异教徒的义务;有的是为了逃避婚姻、家庭、社会的压力;还有的是被神秘的东方吸引而来。或许不同的个人目的是女传教士来华的偶然因素,但使“中华归主”为目的的传教工作的需要,成为众多女传教士来华的必然。

### 三、基督教女传教士在山东的活动

来华新教差会通常由一所祈祷堂,一处教堂,一所或几所学校,一家小诊所或一家医院,传教士与中国同事、助手的住处组建而成。〔3〕由这种构建看出,新教差会的活动不外乎布道、教育、医疗三种主要形式,在山东的女传教士当然也离不开这个范围。

#### (一)布道活动

##### 1、布道活动概况

传教初期,对山东上层社会群体“直接宣讲基督教,其情形恰像把几滴水洒在坚硬的石头上,一丝一毫也渗不进去”。〔4〕针对近代山东城市居民对宗教的普遍淡漠,女传教士将传教的对象定在乡村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妇女身

---

〔1〕 Arbella Stuart Wilson, *The Lives of Mrs. Ann H. Judson and Mrs. Sarah Judson*, quoted in Joan Jacobs Brumker, *Mission for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P. 80. 转引自(美)艾伦·戴维斯著,姬红译:《妇女的互助工作——美国新教女传教士在中国》,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8期,第22—23页。

〔2〕 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载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学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3〕 K·S·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 418

〔4〕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二),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九卷,第二期,第14页。

上,包括老弱无依者,乞求救济的“吃教者”,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没有知识,更没有社会地位。这些人处在偏远的山村,受中国士人的传统儒家礼教的约束比较小,生活与观念较纯朴,比较容易接受基督教的讲道与信仰。特别是妇女备受政权、族权、父权、夫权的压迫,苦难最为深重,她们祈盼在宗教中寻求精神的慰藉,这就为女传教士的布道活动创造了条件。

鉴于女传教士布道活动的对象主要分布于广阔的农村,乡村旅行布道(又称巡回传教)成为拓荒时期布道的主要形式。早期山东著名的两位女传教士慕拉蒂和高第佩夫人(Mrs. Crawford)都有长期旅行布道的经历。1885年,慕拉蒂“在平度的头6个月中,访问了122户城镇家庭,33个不同村庄的几百户人家。”<sup>[1]</sup>1875年,高第佩夫人通过不懈的努力走访了131个乡村;在登州30年里,或挨家挨户拜访,或开班授课,劝诱妇女参与公众礼拜仪式,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做乡村旅行布道。”<sup>[2]</sup>女传教士起初只身深入内地,后来有了中国布道员的陪同,她们跋山涉水,餐风露宿,以坚决的宗教热诚与使命感,在各种不受当地人欢迎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展开宣教工作,散播基督的种子,吸引民众皈依基督。

一位西方学者在研究女传教士的乡村旅行布道时说:“只有乡村向基督教开放和女性传教士工作的意义得到重视及扩展,乡村旅行布道才变得切实可行。女传教士在乡村旅行布道中需要具备在户外演讲的技巧、充沛的体力与独特的个人魅力。不论在传教士家中,或当地妇女家中,或是在路边的树下,都要让听道者理解所讲的内容。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理好文化上的差异”。<sup>[3]</sup>应当说,乡村旅行布道对女传教士的难度是很大的,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她们都要承受超强的负荷,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坚韧的神经从事此项活动的。因此,当基督教拓荒时期渐至尾声时,女传教士又有了新的布道方式。

随着新教势力向山东内地的扩展,城市布道“成为和乡村布道相辅相成不

---

[1]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109.

[2] R·C·Forsyth,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 179

[3]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71.

可或缺的”一种布道形式。各教会进入城市后,通常先购房租地建立一个街头小教堂(Street Chapel),做为日后传教活动的基地。女传教士多在街头教堂中组织宗教聚会,吸引来往的民众驻足听道。她们以此为中心到街头巷尾散发宗教书籍、小册子,到教徒家中做礼拜,有时还将活动的范围辐射到周边的乡村。为达到传播基督教知识,扩大教会影响的目的,女传教士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如街头、路边、集市、庙会等。市集是山东传统的商业形态,多集中在较大的村镇,届时附近数里至十余里的村民都会来赶集,这无疑是女传教士吸引大量听道者的绝佳时机。而美以美会的女传教士则最会利用五岳之首的泰山带给她们的独特优势。“清末民初山东道、佛的信仰虽然不盛,但定期或不定期的去寺观进香膜拜,已成为一部分人民的习惯”。<sup>〔1〕</sup>《泰安县志》记载4月8日为妇女赴泰山行宫烧香之日。<sup>〔2〕</sup>美以美会泰安布道站的女传教士在泰山脚下搭建帐篷,专为五湖四海去泰山拜祭的香客宣传福音,其中有不少人听道后对基督教义产生了兴趣而皈依基督。

内地会的马茂兰夫人(Mrs. McMullan)首创山东监狱布道的形式。马茂兰夫人在烟台花边学校的工作因身体原因渐被其女儿替代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布道工作上。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中占主导地位的以“拯救个灵魂为目的”的传教政策也影响着马茂兰夫人,人人得救的愿望使她对“在监狱沮丧度日的囚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马茂兰夫人在得到烟台道尹的特许下进监狱探监,条件是她进入后必须与囚犯同被锁在狭小拥挤的囚笼中。<sup>〔3〕</sup>对基督的忠诚使马茂兰夫人无所畏惧,从容地面对囚犯唱圣诗,传福音一切犯人不但守秩序,且都聚精会神地听。后来,马茂兰夫人又进入女监布道,并说服了道尹,获准她将织花边的板架带进女监。这样,她可以一边教授女犯学织花边,一边来宣传福音,“教唱简单圣诗”。“女犯们认为能有一份工作使犯人来打发那漫长、乏味的日子确属一件愉快事”。<sup>〔4〕</sup>此后,烟台有了“监狱布道会”之设。马茂兰夫人不仅仅是创立了一种新的布道形式,她在使更多的人感受到耶稣仁

〔1〕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127页。

〔2〕 《重修泰安县志》卷6页14,转引自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年(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127页。

〔3〕 穆马快乐:《我的一生》,曲拯民译,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十一卷,第二期,第126页。

〔4〕 穆马快乐:《我的一生》,曲拯民译,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十一卷,第二期,第126页。

爱的同时,也使囚犯这一被当时社会所鄙视、遗忘的群体,重新有了一种做为人的意义。

据《中华归主》1919~1920年统计,山东有新教教徒41821人,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其中女教徒占到36%，“这一数字在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社会风气保守的旧中国,不能不令人吃惊”,<sup>〔1〕</sup>这主要归功于女传教士在妇女布道活动中的努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布道活动一直是新教教会各项活动的核心,而女传教士的布道活动也成为此核心的重要组成因素。各教会普遍认为:“应把精神方面的工作放在首位,因为这一工作是其他所有工作的基础,舍此,其余的一切都是无用的,忽视这一工作,我们的全部努力就是徒劳无功的”<sup>〔2〕</sup>

## 2、妇女圣经班

女传教士在布道活动中发现,大多数山东妇女是文盲,根本不能阅读散发的各种基督教书籍、小册子,往往无法开展布道工作,于是各种妇女圣经班便应运而生。高弟佩夫人和狄考文夫人(Mrs. C. W. Mateer)都认为:“福音传道和学校教育无论在何时,都是妇女工作者的两项主要工作。实际上,这两项工作又是紧密相连的。教会学校,尤其在女性组织下时,就是传教的机构;传道工作,当涉及年龄偏大的孩子时,又包含有很多教育的因素”。<sup>〔3〕</sup>妇女圣经班主要是为基督争取信徒的布道活动服务的,因此本文把它归于女传教士的布道活动的范畴中。

根据妇女圣经班侧重的目的有所不同将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妇女圣经班严格讲应该称为识字班、学道班,它的目标,即“要使本教会的所有女教徒至少能阅读一些简明基督教书籍。”这种圣经班为期短,约几周时间,招生对象比较宽松,由女传教士教授识字课和宣讲圣经。比如“济南长老会更开办了多期

〔1〕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2〕 弗瑞迪:《美以美会山东传教事略》,郭大松译,出自法思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一卷,第二期,第49页。

〔3〕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81.

‘国语注音字母班’，教授妇女利用注音字母来学习汉字”。<sup>〔1〕</sup>这种圣经班相对于文化程度极低的乡村妇女来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取得的效果自然十分有限。

随着妇女圣经班教育的发展，女传教士办起了正规的妇女圣经学校(Bible Training School or Woman Training School)。此类学校的目的除了培养有志于献身宗教事业的本地女布道员外，还要将男布道员的妻子培训成他们得力的助手。一位教会人士曾形象的指出：“我们越来越发现，只有中国自己的‘女儿们’才能承担对其宣讲福音的责任”<sup>〔2〕</sup>可见，教会也认识到本地女布道员在扩大基督教影响，争取信徒方面的重要性。另外，在女传教士们看来：“当一个有才能、受过教育的男人同一个无知识的女人结了婚，这个女人无知到成为其障碍的地步时，他还能做些什么呢？”<sup>〔3〕</sup>更何况对教会来说，这些“有才能的男人”日后将成为山东各区域教会的领袖，他们的妻子自然要辅助丈夫的布道工作，没有受过必要的基督教育，怎么合乎教会的要求呢？

正规的妇女圣经学校招生对象限制为女基督徒或男布道师的妻子，学制一般3—6年不等，除了详尽，循序渐进的圣经学习之外，还包括阅读、简单的算术、地理、生理等学科的课程“还进行有关家庭和社区中实际问题方面的教育”。<sup>〔4〕</sup>起初由女传教士授课，后来“中国教师在传教士总的指导和监督下授课”。学生毕业后大都从事基督教工作，比如美以美会泰安布道站妇女圣经学校的学生们，在校期间即跟随女传教士进行乡村旅行布道，毕业后或充当本地女布道员，或担任教会学校的老师。

各类妇女圣经教育不仅是妇女工作和差会工作的组成部分，它的成果的

---

〔1〕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2〕 Luella Miner, *The Place of Woman in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载 D. Macgillivra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8),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8, P. 328.

〔3〕 罗嘉礼夫人：《基督教1914年以前在山东的妇女工作概述》，郭大松、纪丕霞译，出自法恩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二卷，第四期，第66页。

〔4〕 罗嘉礼夫人：《基督教1914年以前在山东的妇女工作概述》，郭大松、纪丕霞译，出自法恩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二卷，第四期，第66页。

大小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女传教士进行布道工作的智慧和能力。以英国浸礼会女布道会为例,7名单身女传教士和21名中国女布道员在1910年共负责各类圣经班多达24个,共计参加听道人数640名。<sup>[1]</sup>这种成绩,恐怕一些男传教士也是望尘莫及的。

### 3、慕拉蒂的布道思想

谈到近代山东传教士的布道活动就不能不提及著名的女传教士慕拉蒂,值得称道的不仅是她在美国南浸信会信徒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还因为她是当时山东少有的几位在布道活动中颇有成就的传教士之一。她在布道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及采用的方法等,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布道思想。

慕拉蒂(1840—1912),美国南浸信会在山东的女传教士,生于阿尔巴马一个种植园主的家庭,在家中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三,父母皆为基督教徒。1857年,慕拉蒂在弗吉尼亚女子神学院获文学士学位后,继续在浸信会的附属女校深造。186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据说是第一位获得硕士学位的美国南方妇女。<sup>[2]</sup>自从1859年她皈依基督后,宗教成为其生活关注的重心,1873年慕拉蒂志愿赴中国宣教。起初,慕拉蒂在登州开办了一所女校,因不断遭人反对妨碍了学校的发展,她逐渐转向对乡村妇女的福音布道事业上。从1885年开始,她全身心投入于开拓布道事业。<sup>[3]</sup>可以说,慕拉蒂鉴证着山东教会的妇女工作和美国南浸信会华北差会布道事业创建的历史。

慕拉蒂象许多在山东开拓工作的早期传教士一样,传教对象选择为社会下层的贫苦人民。或许因为她有着美国乡村的生活背景,因此对中国乡村的民众在情感上更加偏爱。慕拉蒂认为城市的居民心存敌意、虚假、难以接近;而乡村由于外国人到访少,在民众产生厌恶感之前,传教士便可融进他们的生活。1880年早期,她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假以中国传统的“阴阳论”,阐释了乡

[1] 柯克兰德:《山东(英国)浸礼会女布道会史略》郭大松译,出自法思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第41页。

[2] James Edward T., ed. Notable American Women 1670 - 1905: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570 - 571.

[3] James Edward T., ed. Notable American Women 1670 - 1905: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70 - 571.

村与城市之间的鲜明对比。慕拉蒂认为,乡村和城市代表中国社会两种占支配地位的特性。她进一步分析:城市表示“羞怯”,以登州淤塞的渔港为典型,挤满了不幸的穷人,到处是衰败的围墙,无窗门的家园,毫无生机;乡村虽然贫困,但代表着当地民众自立和生机勃勃的精神。<sup>[1]</sup>慕拉蒂的这种观念也坚定了将早期的布道工作放在乡村的决心,这也成为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1885年,慕拉蒂选择平度做为她新的布道活动开始的地点。为适应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传统,她尽可能抛开西方的礼仪风俗,还因此令一位男传教士勃然大怒,因为慕拉蒂拒绝以西方的礼仪与这位男传教士握手问候。在生活习惯上,她也力求与本地乡村民众尽量贴近,还将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至邻里居民的中等阶级的水平。慕拉蒂认为,要为上帝赢得这些异教徒,必须我们自己要首先赢得他们。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她通过种种方式与乡村民众增进友谊,使他们在接受自己的同时,也为宣扬基督教打开了方便之门。

慕拉蒂把在布道活动中与乡村民众交朋友看作一种“高雅的艺术”。她极力避免出现急于进入中国人家庭传教的唐突现象出现,起先慕拉蒂用摆在门口的糕饼吸引小孩子,通过他们进而认识了许多位对基督教感兴趣的母亲。“她的布道原则不是被动的等待人们的寻访,而是用极大的热诚和仁慈主动接受所有来访者”<sup>[2]</sup>即使这些来访者只是出于对西方服饰、摆设,甚至只是对慕拉蒂个人外表的好奇,她也耐心地进行招待。慕拉蒂就从诸如烹饪、缝纫、洗衣、提水这些日常琐事中入手,逐渐打消了乡村民众的戒心,日益走进他们的生活,被人们所接受。慕拉蒂曾回忆道:“以前我一走到街上,就会有人呼叫‘魔鬼’……现在走到街上,朋友和邻里总会报以热情的问候”。<sup>[3]</sup>慕拉蒂主张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强迫的过程,而应自然的被人们接受。因此,在给本国差会的一封信中说:“我们需要走出去与她们生活在一起,处处体现基督

---

[1]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101.

[2]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107.

[3]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107.

仁爱的精神,在皈依基督前,需要先和他人交朋友。”〔1〕

1888年,来自沙陵村对基督的渴望使疾病缠身的慕拉蒂打消了回国休假的计划。她紧急召来在登州的高弟佩夫人,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为沙陵村的男女老少宣讲福音,慕拉蒂的布道思想也再一次得到实践。二人的辛苦终得回报,成群结队的村民拜访她们,有30个人组成稳定的骨干成员,于每周内举行4次礼拜仪式。1889年,成立了沙陵布道站。慕拉蒂以亲切又合于实际生活的方式将基督的爱心与教义一并展现出来,既赢得了乡村民众的信赖,又取得了较好的布道成果。因此,有学者将她在山东南浸信会传教士中的地位等同于山东长老会的先驱郭显德。

## (二)教育活动

山东为“孔孟故乡,受儒教薰习,士民好学、尚礼”,为尽快打开基督教在山东的局面,各教会纷纷以教育做为在山东传教的辅助手段。倪维思认为,基督教教育应该和传播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它们是“上帝赋予教育打开天国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福音的手段”。而当时女学教育在山东还是一个处女地,“没有任何竞争限制”,这为女传教士创办女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1860延至20世纪20年代,是教会女教育的扩张时期,山东的教会女校规模不断扩大,程度逐步加深,系统趋于完备,女传教士的教育工作涉及从幼儿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的普通教育和启喑、实业等特色教育。

### 1、普通教育概况

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是以教会学校为发端的。不少女传教士来华前都有当过老师的经历,“来华后,除部分从事传教和医护工作外,多数进入教会学校任教”。〔2〕山东最早的教会学校是美国长老会倪维思夫人(Mrs. Nevius)于1862年与丈夫在登州开办的一所女童寄宿学校。它不但是山东第一所新式学校,也是女传教士参与教育工作的发轫点。1868年时,该女校“与狄考文妻妹邦姑娘所办的女学合并到察院后,成立了女子文会馆”。〔3〕“1912年新校舍

〔1〕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qs*, Camb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109.

〔2〕 《在中国的美国女传教士研究》(书评),载(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辑,转引自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载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

〔3〕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6年,第156页。

落成时,吸引了本地绅士、地方长官、暨烟台美国领事部‘惠临增光’”,<sup>[1]</sup>住宿学生达92人。1864年,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开创一所男童学校,即“蒙养学堂”,也是齐鲁大学的前身。狄考文坦陈,开办蒙养学堂的意见是由妻子提出的,据称从1864—1873年狄考文夫人独自负责了学校全部工作的2/3。<sup>[2]</sup>因为狄考文夫人不能生育,她在承担学校首席教师和管理者的同时,也充当学生养母的角色。1871年,蒙养学堂改设高等科,从小学升为中学,改名为登州文会馆。1882年,正式升为具有大学水平的登州学院(Tengchow College),中文名仍沿用文会馆。此时在总共5位外国教师中有3位是女性,她们是狄考文夫人、赫士夫人和狄考文的妹妹丽莲,她们可以说是第一批在山东从事高等教育的女传教士。

长老会系统其他女传教士所办学校较著名的有,1866年,郭显德在烟台毓璜顶创办一所小学后,又指导唐宁小姐(Miss C·B·Downing)开办会英女校,后来与男校文先合并管理,取名会文,唐宁小姐负责会文小学部的工作。唐宁小姐还一直捐款赞助早期长老会小学,并为英文馆(后易名为实益学馆)的创建欣然捐款三千元(墨币)。1920年,会文、实益二校合并成“益文学校”,有不少传教士的妻子担任教员。1888年,聂惠东夫人创办翰美学馆(女塾),1895年办女子寄宿学校,皆为小学程度,“学生不过三、四十人,辛亥革命后学生增至七、八十人”。<sup>[3]</sup>约1900年左右,在郭显德第三任夫人的指导下,创建毓璜顶幼稚园(Temple Hill Kindergarden),这也成为烟台幼儿教育的开端。1912年,该幼稚园新校舍建成后,“食宿设施每学期可收60—70名孩子。”<sup>[4]</sup>

美国公理会女传教士博美瑞于1893年在庞庄创办了只有4名女童的寄宿学校“培贞阁”,程度由蒙小提到高小,以放足为入学的条件,第一批毕业生由北京和女校(Union Woman's Shool)授予文凭。1917年,该校迁往德州,改

[1]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6年,第156页。

[2]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159.

[3]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58页。

[4] 阿美德:《抗战前的烟台社会、宗教与教育》曹立前译,郭大松校,出自阿美德编撰并自行出版的《图说烟台通志》1936年。(A. G. Ahmed: Comp, Ed., and Pub., Pictorial Chefoo)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一卷,第一期,第44页。

名为“卫氏女学校”，属中等教育机构。1905年，叶理士夫妇在果子巷办小学，1908年又拓收了30余名住宿生。

美国南浸信会海雅西夫人于1893年在登州开办寄宿女校，她逝世后至1911年，相继由哈特维尔(Hartwell)、泰勒(Ida Taylor)小姐负责学校工作。另外，在黄县、平度的两年女子寄宿学校分别由斯蒂芬斯夫人(Mrs. Stephens)和西尔斯夫人管理。而与美国长老会相比，南浸信会在烟台的教育工作却迟了40年，1908年，卫灵女校经过2年的准备，开始正式上课，“限幼稚生和初小，男女兼收”。<sup>〔1〕</sup>该校从创建到1902年，校长分别为司提芬夫人(Irene M. Stephens)、浦其维夫人(Anna Seward Pruitt)、浦爱德女士(Ida Pruitt)。

英国浸礼会女布道会在法思远夫人(Mrs. Forsyth)帮助下至1910年在青州七个村庄开办了女校。沙德茨小姐(Miss Shalders)在青州开办了一所有17名学生的寄宿学校，1899年学校因沙德茨小姐生病而关闭了。同年，文学硕士辛弗顿小姐(Miss H. Sifton)来到青州，在熟练掌握汉语后，接管了重开的寄宿学校。该布道会在青州、邹平的两处布道站至1910年，共有寄宿学校、乡村学校22所，7名单身女传教士负责全部的工作。

德国同善会于1905年由尉礼贤主办了一所女校，用其妻名命为“美懿书院”，由他的妻妹同善会女传教士华姑娘(Miss H. Blumhardt)任校长，当时学生仅有5人。1912年与“淑范”女中合并。同善会还办了一所“淑范女子中学”，仍由华姑娘任校长，在三年小学的基础上增设三年中学课程，另有2名外籍女教师教授德语，健美体操、绘画、音乐等课目，1913年有学生70人。

德国信义会在印度开展工作的“东方妇女协会”(Morgenlaendische Frauen Verein)派出了索尔小姐到胶州，不久即开办了一所女校，1910年该校由两名女传教士负责，有学生52名。此时德国信义会还创办了24所幼稚园。

女传教士所创办和主持的初级、中级学校尚不足以在质与量上充分解决近代山东女性的教育启蒙问题。但毕竟开了山东女子教育之风气。她们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们所有旧的落后观念，增加自然科学的知识，培养合乎基督的性格和伦理道德的观念，以实现自我价值，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据《中华归主》

〔1〕 曲拯民：《美国浸信会在烟台创卫灵女校，焕文男校》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十五卷，第四期，第81页。

统计,山东新教教会的初级小学居华北第一,教会中学与高等教育也居全国前3名,其中就有不少女传教士的功劳。

对待教育,“中国人最初的反应包括各种各样的否定态度:冷漠、怨恨、蔑视、惊恐等等。”<sup>〔1〕</sup>这种闭关自守造成的愚昧夹杂着反侵略的民族感情和文化本位主义,使女传教士的招生工作颇费周折。1873年3月,在烟台办女校的唐宁小姐写道:“在我挨家挨户访问过程中,我见到了许多想要的女该正生活在罪恶和无知当中,但是她们的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亲属们说‘宁愿让她们忍饥受饿’也不愿让她们的女儿来我们学校接受教育,而却愿意把女儿卖身为奴隶或者奴隶更不如的身份。”<sup>〔2〕</sup>当时国人对“外族蛮夷”既恐惧又憎恶,对西方的文化、教会也不了解,而关于传教士“剖儿剜眼”的流言四处传播,加之人们认为女子出外上学“抛头露面,有损妇德”,因此教会女学的生源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女传教士采用免费入学、提供食宿等优惠条件,招收中国下层贫穷子女入学。这些人家抱着“既无损失,或可能有所得”的心态,出于对温饱的渴望,或出于减轻家庭负担的想法送子女入学。教会学校对女生的年龄限制不严格,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多数中小学生在基督教家庭,“传教士们开始改变全部免费提供教育的做法,并订立某些规章制度。”<sup>〔3〕</sup>

教会学校“目前所开的课程中把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最佳地组合在一起,故被认为极有利于我们的办学目标。”<sup>〔4〕</sup>因此,在课程安排上,除必修课《圣经》外还开设了一些浅近的国文、算术、地理、历史等。狄考文夫人还在登州文会馆开设了音乐课,对陶冶学生的性情十分有益。针对女学的特点,还开设了家政课,教授诸如缝纫、烹饪、编织、刺绣等课目。在师资方面,一般由女传教士、本地教授中国经典的老先生、毕业于教会女校的学生三方面组成,多采用朗诵、背诵、记忆等教学方法。

〔1〕 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中译本),曾矩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2〕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1921~1922,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1922. 转引自陆菁:《鸦片战争后教会女塾在中国的兴起》,载《史林》1990年第4期,第55页。

〔3〕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4〕 《登州文会馆概览,1891年》第23页,转引自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矩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教会女校的毕业生除少数成绩优异者可以到北京更高级别的教会女校深造外,大都充实到各教会的服务人员队伍中。这些毕业生有的担任教会开办的各类学校的教员,还有的被中国人自办的学校和医院聘为工作人员。正是由于她们的努力工作为母校赢得了荣誉,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教会女校,逐步消除了对教会女校的敌意和偏见,学生的来源也不象以前那样困难了。部分中上层的中国人思想渐趋开明,也认识到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性,也有送自己的女儿到教会女校读书的。有教会人士说:“基督教差会所掌握的最有效的力量,就是差会学校累积的力量”,<sup>[1]</sup>而在人员的力量方面则非差会学校的毕业生莫属。

## 2、启喑教育

要论及女传教士在近代山东兴办的教育事业中,具有全国首创性和深远意义的当首推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梅理士(Charls Rogers Mills)与其继室夫人梅耐德共同创建的启喑学校,即聋哑学校。

阿妮德·E·汤普森(Annette E·Thopson)(中文名为梅耐德),纽约鲍狄吉人,从小与她异父母的聋哑弟弟一起长大,因此对这个弟弟倾注了所有关爱之情。罗切斯特启喑学校的一位专家因惊叹于汤普森与聋哑弟弟交流的能力,送她去波士顿接受专业的训练,并成为罗切斯特启喑学校的首席教员。<sup>[2]</sup>1879年,她遇到了刚丧偶不久的梅理士,梅的聋哑儿子就在罗切斯特启喑学校上学。汤普森与梅理士志趣相投,相伴于1884年来到登州,同年二人在烟台结婚。

做为一名聋哑教师的天性使汤普森无法割舍对聋哑教育的热爱,而梅理士目睹爱子所遭受的不幸,内心也不胜痛苦,近代山东乃至全国第一个聋哑学校便在志同道合的夫妻二人的努力下诞生了。

经过梅理士夫妇两年多的筹备工作,登州启喑学馆于1887年成立。因为

---

[1] 小斯坦利:《美国公理会华北差会的山东工作(1867-1911)》,出自法思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一卷,第一期,第39页。

[2]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85.

启喑教育在全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不为众人所了解,加之大多数山东民众生活极度窘迫,入学的聋哑儿童“寥寥无几,开始只收到一名贫困木匠的儿子,衣食全由校方供给,以后才逐渐增加到4人。”<sup>〔1〕</sup>1895年,梅理士的病逝给梅耐德的精神和启喑学馆的运作以双重打击。“梅耐德不顾丧夫之痛,四处奔走多方求助,”<sup>〔2〕</sup>以求因停供经费而关闭的启喑学馆能尽快复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获得美国罗切斯特学校的资助后,梅耐德于1898年在烟台复办聋哑学校,定名为“梅理士启喑纪念学校”(Charles Rogers mills Memorial Schools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又称“中国烟台启喑学校”。1903年到1906年,梅耐德遍访欧美寻求援助,得到了美国1万9千多名聋哑学生和数位聋哑学校教授的热心捐助;财政困难缓解后,梅耐德又说服美国加勒德大学有名的聋哑教授其外甥女葛爱德(Anita E·Carter)于1906年来到烟台,共办聋哑教育。<sup>〔3〕</sup>从此举步维艰的初创时期结束了,烟台启喑学校进入了不断发展和壮大的时期。

首先,启喑学校的各项系统建制趋于完善。由于“完全是基督教性质的学校”,烟台启喑学校在招生原则上遵顺“无论基督教哪个宗派,还是异教徒出身的孩子,都予接受。”<sup>〔4〕</sup>从1907年葛爱德在学校开设女生部后,学生分男女两部学习,梅耐德与葛爱德除分兼男女学部主任外,还分任学校的正、副校长,主管学校的各项事务。另聘请本地老师教授木工、花边制造等工艺课程。学校的教材由梅耐德依据美国启喑学校的教材编撰而成,并制作了符合中国儿童学习的图表、语音卡片等辅助教具。葛爱德也专程回国“考察美国聋哑各学堂新出之教授等,”<sup>〔5〕</sup>制定出适宜的课程安排和工作计划。因此,烟台启喑学校的教学方法,并不逊色于西方国家。

---

〔1〕 王立夫:《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烟台启喑学校》,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集粹》(教育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2〕 郭大松、曹立前:《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启喑教育》,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39页。

〔3〕 王立夫:《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烟台启喑学校》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集粹》(教育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4〕 梅耐德:《烟台中国启喑学校》曹立前译、郭大松校,出自法思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十八卷,第四期,第11页。

〔5〕 [美]梅女士:《烟台启喑学馆记略》,载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8页。

最能体现烟台启喑学校特色的是课程安排上的系统化和专业化。梅耐德与葛爱德将全部课业分为三部分,计在 10—12 年内完成,每一部分的实践要分别贯彻如下宗旨:“即给他们一种用语言或文字同伙伴交流的方法;教给他们一些有用的手工艺、或训练他们做一个看家的人;教给他们一些人生责任的观念和救世的知识。”<sup>〔1〕</sup> 第一部分,即在学习的头 2—4 年,教授聋哑儿童讲话、唇读、使用语言的能力和书写这些入门课程,为以后深入的学习做准备。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梅耐德为最大限度的保证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忠告人们:聋哑儿需尽早入学,最佳年龄在 6 岁左右。完成以上课程学习后,会依照正常学校的课程进行设置,聋哑儿童将继续按自身能力学习国文、地理、算术等课目。梅耐德等人期望学生毕业后具备以下能力,“通过讲话、唇读、或书写,询问和回答与他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所有必要问题,能够领会语言文字。”<sup>〔2〕</sup> 在第二部分中,学校聘请本地老师教授孩子们工艺科目。女生学习缝纫、刺绣、编织、抽绣、做花边、烹饪等;男生则跟随专门老师学做排字、木工、手工、机器编织,使他们日后都有一技傍身。第三部分的课程毫无例外的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设置为基督教教育,《圣经》课、唱赞美诗和祈祷是每日必须的课业,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到学校“在散播基督之爱”。

其次,启喑学校的影响与规模不断扩大。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启喑教育真实可信和大有裨益,1908 年梅耐德带领师生开展了一次中国启喑教育史上意义非凡的宣传活动,她们“长途跋涉 3000 余英里,访问了 16 个城市,召开了 50 多次会议,在 30000 多名中国人面前做了示范表演。”<sup>〔3〕</sup> 这次宣传活动不但达到了让普通民众认识启喑教育的目的,更令人可喜的是在清政府内部

〔1〕 《烟台中国启喑学校 1912 年度报告》,出自季理斐编《中国差会年鉴》,(1913 年)上海广学会出版。(D. Macgillivra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3),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卷,第三期,第 52 页。

〔2〕 《烟台中国启喑学校 1912 年度报告》,出自季理斐编《中国差会年鉴》,(1913 年)上海广学会出版。(D. Macgillivra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8),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卷,第三期,第 52 页。

〔3〕 梅耐德:《烟台中国启喑学校》曹立前译、郭大松校出自法思运:《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 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十八卷,第四期,第 10 页。

也激起了一定影响,随后“试办启喑学校”和培养启喑教育师资的计划也陆续制定出来。在此次宣传活动后的第2年效果立现,已有“来自全国九个省份的40名聋哑儿在校学习,”<sup>〔1〕</sup>并有5名正常男女教师和一对来自朝鲜的夫妻在校接受训练。学校还为应付对师资的日益需求制定了相关措施:“从西方国家引进有数年教学经验的最优秀的教师,让他们掌握汉语,为了培训出合格的启蒙教师,要制作图表,编撰教科书,建立一套完整体系,该体系的教学方法将适合中国各个地方使用。”<sup>〔2〕</sup>1914年暑假,葛爱德和栾夫人(Mrs. Lan)“率女生部的本地教师,参加了在朝鲜平壤举行的‘远东盲、聋人教师大会,。”<sup>〔3〕</sup>通过此次大会,烟台启喑学校“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会后,葛耐德与一位朝鲜教师回烟台接受专门训练,为日后负责朝鲜一所启喑学校做准备。1917年左右,在美国罗切斯特启喑学校学习的一位烟台启喑学校的毕业生,出色地通过了评议员组织的考试。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启喑学校在海外的影响。

烟台启喑学校在全体员工的辛勤努力下,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不但继续得到英、美各团体的援助,国内许多热心人士也倾情伸出援手。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包言昌来信允诺,接受聋哑生去学打字。烟台启喑学校在山东扎下根后,将启喑教育在全国范围繁衍开来。从烟台启喑学校创建到1919年间,新开设了8间聋哑学校,除湖南省救济院盲哑学校有关情况不详外其余7间学校皆与烟台启喑学校有密切的关系。<sup>〔4〕</sup>这7所学校,或为烟台启喑学校的毕业生所创办,或为原教工创办,他们在扩大启喑教育影响的同时,也普及

---

〔1〕 梅耐德:《烟台中国启喑学校》曹立前译,郭大松校,出自法思运:《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十八卷,第四期,第10页。

〔2〕 梅耐德:《烟台中国启喑学校》曹立前译,郭大松校,出自法思运:《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十八卷,第四期,第10页。

〔3〕 《查尔斯·罗杰斯·梅理士启喑纪念学校1914年》出自季理斐编《中国差会年鉴》(1915年)上海广学会出版。(D. Macgillivra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5),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卷,第三期,第54页。

〔4〕 郭大松、曹立前:《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启喑教育》,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42—43页的表格。

了启暗教育,使更多不幸的儿童获得新生活的权利,这种积极的社会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 3. 实业教育

“山东为传统制度和文​​化强固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变迁上很少处于倡导的地位,但因人民贫困,苟有人教以改善生计之道,不空谈理论,有立竿见影之效,亦无不接受。”<sup>〔1〕</sup> 教会实业教育便有此特点。山东各教会中最典型、也是最为系统的实业教育则当属马茂兰夫人(Mrs. McMullan)的花边学校。

马茂兰夫人,1866年出生于英国卜瑞斯克城,家人称她作蕾莉。“某次,在‘救世军’讲道大会中她的人生观开始改变了,遂决志事奉上主。”<sup>〔2〕</sup> 蕾莉到中国以后,在扬州一个教会场所遇到了来自爱尔兰的马茂兰(James McMullan)。在马茂兰眼中,蕾莉是一个不重时尚、个性爽朗的姑娘,两个人互相爱慕,于1888年在重庆举行了婚礼。由于生活艰苦,环境不适,马茂兰的健康状况恶化,“差会着他到中国北方去换气候,调养一番,”于是夫妇二人来到烟台。

烟台是山东较早开放的口岸,临渤海湾,气候宜人,马茂兰很快康复。马茂兰夫妇在烟台见到众多饥寒交迫的穷人,深感同情,认为“进行实际的工作和传道相辅并行才是上主的真正旨意,”<sup>①</sup>但其母会内地会对此倡议不予考虑,马茂兰夫妇于是脱离了内地会。1893年,二人建立烟台工艺会(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又称奇山会。其中,花边学校的工作是马茂兰夫人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工作。

编织花边的技术是由美国长老会的海雅西夫人首先教授给胶东妇女的,“初不过为女教徒之消遣,制品仅供家庭装饰之用。”1894年,海雅西夫妇离开中国,马茂兰夫人接管了花边工作。在她的积极准备下,从1896年开始,一所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校建立起来,其宗旨是:(1)引领学校信奉基督,塑造学生合乎基督的品格。(2)使学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可以诵读《圣经》,成为社会

---

〔1〕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下),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第470页。

〔2〕 穆马快乐:《我的一生》(China Born),曲拯民译,(台湾)《山东文献》,第十一卷,第二期,第107页。

有用之材。(3)教授学生编织花边,可以在日后需要维持生计。<sup>[1]</sup>

烟台花边学校(Chefoo Industrial School),又称烟台工艺学校,招生对象为贫寒人家的女孩,后来从收容所营救的身世凄惨、无家可归的女孩也来到花边学校学习。起初,即使是贫寒人家也很少送女儿入传教士开的花边学校,但经过马茂兰夫人多年耐心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加上人们看到编织花边的确可以给家庭带来实惠,送女孩入学的家庭开始增多。到1905年,花边学校的女生由原先的3人猛增到80人。随着学生数目的增多,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新建了校舍,1910年前后,已有150名学生在不同的部门学习。

学校的课程由上、下午两部分组成,并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学校明确规定:入学前,女孩必须放足;“而不参加上午课程学习的女孩将不准参加下午的花边编织课程,”<sup>[2]</sup>否则就违背了办学的主旨。上午的学习由诵读《圣经》和祈祷开始,点完名后,开始上课。女孩子们除了学习《圣经》和教义问答手册外,还学习算术、歌唱、地理、写字。中午12点,上午课程结束。午饭后,女孩子们马上又投入到下午紧张繁忙的花边编织学习中,直到日暮降临。其中的一些女孩可从花边编织中每月赚得3000到4000制钱以供给家用。学校每天都对女孩们的卫生、准时上课情况、日常出勤和学习进展进行记录。每年对学生进行《圣经》和教义问答的考度,一般长老会的人员负责这一考试,成绩优异者获得奖励。

马茂兰夫人还别出新裁地制定了一项“储蓄银行”(Savings Bank)的措施。“她把女孩们所挣钱数的10%储蓄起来,并给予少量的利息,直到女孩结婚之前,这笔钱是不准动用的。这一措施通过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当女孩们结婚前取出这笔可观的积蓄购买嫁妆时,每个人脸上都绽放着喜悦的光芒。”<sup>[3]</sup>

由于花边学校所取得的成功令人羡慕,马茂兰夫人被邀请到烟台周围的

---

[1] James and L. McMullan: "The 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 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 277.

[2] Mrs. Hueber: "Chefoo Industrial School", Records of the Fifth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May 17—20, 1905, P. 301.

[3] Mrs. Hueber: "Chefoo Industrial School", Records of the Fifth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May 17—20, 1905, P. 302

几个村子去开设花边学校。回国休假归来的马茂兰夫人以更充沛的精力投身于花边学校的工作,不断有新的观念和新颖的样式付诸于生产中。更令人惊喜的是,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来自烟台花边学校的女孩凭借精美的花边产品,荣获一枚金牌和两枚银牌,这也给了马茂兰夫人莫大的鼓励去把花边工作做得更好。民国成立后,学校取名“培真”。1925年,马茂兰夫人逝世后,学校的教育工作由其女儿继续。

在众多基督教女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中,马茂兰夫人的花边学校,无论从成绩还是影响上,都是令人瞩目的,她的这一工作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将实际的工作与传道并重结合。马茂兰夫妇目睹烟台民众贫困的景象后,认为改善民生的实际工作应与传教工作相辅并行,他们不惜脱离了不予支持之母会内地会。马茂兰夫人更把这一原则写到花边学校的办学宗旨中,既要教授女孩子们编织花边来维护生计,又要她们接受基督教教育,信奉耶稣。在课程的时间分配上,也是实际的花边编织课程与基督教教育平分秋色。马茂兰夫人作为虔诚的传教士,她希望通过最大的努力和爱心去实现工作的目标:“减轻穷人的痛苦,使他们的灵性和物质方面一并增进。”<sup>〔1〕</sup>因为,这是“上主的真正旨意”。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一位牧师曾说:“工艺一门,实于营业之中,含有教育性质,如妇孺等所具资质,非以工作,效用不显;惟多才多艺,始成善功。”<sup>〔2〕</sup>山东的传统经济以农业为主,男孩是家中的绝对劳动力,男孩的地位远远高于女孩,很多家庭视女孩为“赔钱货”。马茂兰夫人的花边学校教给女孩们赖以谋生的技能,女孩子可以不必出门,不用付成本,在家中利用简单的工具赚取可观的收入,改善家庭的生活。花边制造业也发展成为胶东一带农村的副业,马茂兰还将花边产品销往海外市场,为当地女性就业提供了机会。

此外,德国信义会的索尔小姐来到山东后,“组织德国传教士的妻子们办了一个妇女工艺学校,教学生织花边,拿到欧洲市场出售。”<sup>〔3〕</sup>到1910年,德

---

〔1〕 穆马快乐:《我的一生》(China Born),曲拯民译,(台湾)《山东文献》,第十一卷,第二期,第109页。

〔2〕 来仪庭:《教会工艺之概况》,见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3页。

〔3〕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国信义会已创办了 15 所招收女生的实业学校。

1920 年山东省基督教学校女学生统计表(表二)

国 别	初小女生	高小女生	中学女生	女学生总数	基督教学校 学生总数	女学生占总学生 数的比例
美国差会 (9个)	3035	679	427	4141	13417	39%
英国差会 (4个)	703	220	0	923	6252	15%
德国差会 (2个)	10	11	4	25	687	4%
其他欧洲国家差会 (3个)	129	0	13	142	998	14%

(资料来源:《中华归主》,蔡永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26页;山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6—177页。)

### (三) 医疗活动

#### 1. 女传教士从事医疗活动的起因

医疗工作对传教事业的特殊价值,已得到了传教士的认可和重视,从而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医院所收到的效果比放赈救灾还要大,因为灾荒不常有,而贫困可怜的病人却总是在我们的周围”;<sup>[1]</sup>办医院是发展教会特别有效的方法,“医药所表现的仁慈引起误解最少,而需要却最大。”传教士将医疗活动做为传教的一种手段,救治肉体的痛苦就是为了帮助灵魂的解脱,以传教事业的需要作为医疗事业的立足点,达到引导人们皈依上帝的目的。

近代山东传统的中医“理论和诊断手段在许多方面都已大大地落后于当时迅速发展的西方医药科学。”时有爆发的严重疫情和流行性疾病如天花、疟疾等给山东人民、尤其是挣扎在社会下层的贫苦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时,教会医院常免费为病人治疗和施药,吸引了许多无钱救医的病人。加之西

[1] Alex Armstrong: Shantung, Printed at the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 P. 89.

医对某些疾病有显著的疗效,也赢得不少信任。而来到山东的不少传教士也因水土不适和各种疾病被迫回国甚至死亡,从传教士自身医疗保障来说,也急需专业的医生。以上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在“男女七岁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意识影响下,近代山东妇女既不能如男人一般随意去教会医院就诊,也不愿让外国男性医生诊治,“她们情愿由男性医生的妻子,甚至任何一名西方妇女来医治。”<sup>〔1〕</sup>为了便于在山东妇女中开展医疗工作,各教会纷纷呼吁派遣女医生来山东工作。此外,教会专门设立女医院,医院中又设有妇科,并配备了女医生和护士,为广大妇女来医院就医提供了方便。事实证明,女传教医生对医疗事业的无上忠诚和极大投入令教会人士十分满意。女传教士自己也坚信:“毋庸置疑,与男人相比,妇女从事医学工作尤其需要有这种奉献精神。由于深夜工作的极度紧张,必须在各种天气下孤寂地长途跋涉,在照料病人方面会遇到许多极其愚昧、确无人道的异教徒习俗,任何男人都无法与女医生或女护士的奉献相比。”<sup>〔2〕</sup>女传教士的爱心和奉献精神将上帝的福音以医学这种仁慈的方式托付人类,以消除愚昧,令许多家庭感受基督的恩惠。

## 2. 医疗活动概况

1835年11月4日,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主持的广州眼科医院正式开放,由此奠定了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起点。伯驾也是第一个来华的有正式身份的传教士医生。1870年,英国浸礼会医生卜维廉(William Brown)做为医药传教士来到烟台,开办了一家小型医院,并将一些基本的英文医药书籍译成中文,还收了4名学生,“他是山东播下西医治病与西医教育种子的第一人”。“除青岛外,在每处布道站都开展医疗工作,一直是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

---

〔1〕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84.

〔2〕 罗嘉礼夫人:《基督教1914年以前在山东的妇女工作概述》,郭大松、纪丕震译,出自法思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二卷,第四期,第63页。

的政策。”<sup>〔1〕</sup>到1877年,长老会在山东的第一位女医生安德森(S. J. Anderson)加入济南布道站,1879年医学博士亨特(Hunter)和夫人的到来加强了医务力量,由于健康原因,三人不久返回美国。

长老会系统第二位女医生克莱茜于1879年抵达登州,后来调往日本。1883年长老会又派医生聂惠东与夫人到登州开展医疗工作,“1890年到济南后,与洪士提反夫妇和安德森建立了女士医院。”<sup>〔2〕</sup>在烟台的传教士郭显德“早在中学就自学过医,他继弦的第三位夫人是加拿大来华传教士,夫妻配合,相得益彰,”<sup>〔3〕</sup>常为周围邻居、朋友、学生等义务诊治赠药。1906年回国休假的郭显德向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嵇尔思医生(Dr. Oscar F. Hills)讲述了在烟台建一所医院的想法。1908年嵇尔思夫妇被派到烟台从事医疗工作。在学习汉语期间,嵇尔思医生在“训练有素的护士郭显德夫人”的大力协助开办了一家小诊所,经过规划扩建,到1914年发展成烟台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毓璜顶医院”,是仅次于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座现代化医院。该院除两位男医生外,还有1名美国护士和11名中国实习护士。1914年全年接待了204名住院病人和9730名门诊病人。<sup>〔4〕</sup>从1898到1910年,长老会有4位女医学博士分别派往沂州、青岛、潍县、济南布道站,大大增强了其医疗工作的专业化。

美国公理会也“强调治疗工作要同传教士较直接的福音传道联合行动”<sup>〔5〕</sup>他们的医疗工作发端于1878年的大饥荒,所建的庞庄医院到1910年

---

〔1〕 方伟廉:《山东的美国(北)长老会》,庄惠娟译,郭大松校,出自法思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卷,第一期,第47页。

〔2〕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6页。

〔3〕 段琦:《郭显德近代在华传教活动之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第58页。

〔4〕 阿美德:《抗战前的烟台社会、宗教与教育》,曹立前译、郭大松校,出自阿美德编撰并自行出版的《图说烟台通志》,1936年。(A. G. Ahmed: comp, ed, and pub., Pictorial Chefoo, 1936.)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一卷,第一期,第41页。

〔5〕 小斯坦利:《美国公理会华北差会的山东工作》,郭大松译,出自法思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7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一卷,第一期,第41页。

已初具规模,在3名外籍医生中,有2名是女性,并十分出色的完成了繁重的医务工作。当年该院已“拥有中国除大城市里的一些医院外所有医院病人的档案。在1881至1901年两个十年的时间里,记下了有案可查的门诊治疗病人数,包括复治病人在内,共计二十三万人,年度记录最高年份是1897年,治疗病人26000名。”〔1〕

美国南浸信会埃而斯(T. W. Ayers)医生1901年在黄县开展医务工作。1911年左右,一位从护校毕业的杰西·L·佩蒂格罗(Jessie L. Pettigrew)小姐负责黄县华伦纪念医院(Warren Memorial Hospital Hwanghsien)女诊部。1909年“奥克斯纳纪念医院(Oxner Memorial Hospital)在平度竣工,以纪念去世的医生奥克斯纳,弗洛伦斯·琼斯(Florence Jones)小姐是该院的一名护士。翌年此家医院治疗病人9000名,平均每天约有40人在两间布道室听道。”〔2〕

美以美会于1897年在泰安创建博济医院(Priscilla Benneth Hospital)。该医院的女传教医生除了诊治来自周围乡村的病人外,相当一部分病人是到泰山进香的香客。女传教医生还负责泰安城内寄宿女校的学生们的医疗检查。

德国同善会于1901年为纪念已故花之安博士,在青岛创建华德医院,1912年由瑞士人黎仪德当院长,另有一名法籍护士长名嘉安丽负责,并在济宁分设医院,除一名医生外,瑞士人梅小姐负责该院护士工作。〔3〕

德国信义会毕业于护士学校的卢维廉夫人于1901年在即墨设立一家小型医院,穆勒护士来华后加入该院医疗工作。〔4〕因就医者众多,医院另建二层楼房一所,设置病床,收住院病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战领,破坏殆尽。

---

〔1〕 小斯坦利:《美国公理会华北差会的山东工作》,郭大松译,出自法思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上海广学会,1917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一卷,第一期,第42页。

〔2〕 慕拉蒂:《山东省(美国)南浸信会史略》,出自法思远《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上海广学会,1912年。(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卷,第三期,第48页。

〔3〕 青岛基督教会编写:《基督教在青岛1873—1980》,(内部影印本)第53页

〔4〕 青岛基督教会编写:《基督教在青岛1873—1980》,(内部影印本)第30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道德贞(A. D. Dodd)在滕县建立了收治麻风病人的“山东最早的专门医院”。道德贞因“悯滕人患麻疯者众,欲筑麻风院”,在得到乡绅赞助的土地后,“1918年春由道女士一手操持兴建,同年春竣工。”<sup>〔1〕</sup>此外,早在1913年道德贞还亲手创建了“滕县基督教华北医院”。出于女性本身普遍具有的同情心,道德贞为处境悲惨的麻风病人提供了获得救助的机会。面对众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麻风病人,不管是为了扩大教会影响也好,还是“出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好,道德贞的这份勇气和热心却是令人称道的。随后,不论是教会团体,还是社会人士,都对麻风病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正是由于道德贞在麻风病院的大胆尝试,成为后来人们攻克这一痼疾的起点。

总的来说,女传教士早期所从事的各种医疗活动,如创办医院、诊所等,大都因场地狭小、设备简陋、经费拮据而勉强维持。比如,美以美会最初在泰安的妇女医疗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天津、顺化、北京教会医院的朋友和个人提供的药品、毛巾、肥皂、绷带等援助,<sup>〔2〕</sup>尽管这样,来求医的病人却很多。面对众多无力承担诊费的穷困病人,这些医院多数是免费医治和施药,往往入不敷出,加之国内外的捐赠有限,时有亏损,对于很多要求增设分医院和分诊所的呼吁,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早期教会的女性医疗工作者,大多由传教士的妻子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等辅助性工作。随着教会医疗工作的深化,对女传教医生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19世纪末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的推动下,美国许多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专业女医生纷纷登陆山东,使美国教会在女医生的力量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各国教会。这种医务人员的专业化不但提高了教会医院的规范化和业务水准,同样也有利于增加山东民众对教会医院的信任度。但布道做为教会事业核心的地位,不会因为手段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女医生和护士一旦行起医来,全日会十分忙碌,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宣教工作。于是很多教会改变以往女传教医生对病人或出外巡诊时直接布道

〔1〕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9页。

〔2〕 Woman's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North China, Peking, 10.5-9, 1899, The Tientsin Press, P. 60.

的方式,派专职人员在病房、门诊室宣读《圣经》、唱赞美诗。很多病人和家属因受医生和护士的爱心救治而感动,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进而成为基督徒,这也是各教会所期望看到的。

### 3. 医学教育

早期教会医学教育是学徒式的,即传教士招收几位从教会中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在诊所或医院中跟着传教医生学习,这毕竟与正规医学教育有着很大差别。随着医疗工作的不断扩大和专业化,需要有大量合格的中国医生、护士来帮助工作,于是设立各级医学学校的计划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188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聂惠东夫妇在登州文会馆设医科,收学徒5名,“开始了山东最早的西医教育。”而在近代山东,妇女医学教育最早始于1889年,长老会的两位女医生玛丽·布朗(Mary Brown)和狄克森(Madge Dickson)在潍坊尝试对女学生进行医学教育。尽管这次实验为期很短,还有3位毕业生成功地开业行医,成为近代山东第一批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的本土女医生。<sup>〔1〕</sup>这项医学教育计划因1899年布朗医生因病退休而宣告终止。1890年聂惠东与洪士提反夫妇和安德森在济南创办华美医校,入学的新生数量很少。女传教士从事医学教育主要集中在护士专业,为山东创立了最早的专业护士教育,培养了山东第一批专职中国护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训练学校。

1913年毕业于格拉斯哥皇家医院的劳根小姐(Margaret Logan)被英国浸社会派到济南共和医道学堂的附属医院,她也成为该院第一个受过训练的护士。劳根小姐在工作中发现,病人的饮食起居多由他们的亲戚朋友料理,“由于他们既不懂卫生也没有营养知识,看护情况远非令人满意,”<sup>〔2〕</sup>因此,有必要改善这种状况。尤其在1915年现代化新医院落成后,目前这种护理水平已完全不能满足专业理想服务的要求。于是劳根小姐在一位中国教员的大力协助下,一边向各个教会学校发放招收护士的通知,一边向人们解释“护士这个职业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经过多方努力,护士训练学校于1915年开学了,

〔1〕 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2〕 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12名新生全部都是高中毕业生,且都是基督徒。在头一个月中,学生们没有课业任务,而被派往新医院委以照料病人的繁重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考验这些候选人,看看他们是否很容易泄气。但到月底只有一个人退出去,这个空缺很快就被填补了。”<sup>〔1〕</sup>随着护士训练学校的发展,不但学生数量增加,而且还招收了专为男病房服务的男性护士。学校将学制定为4年,使用1909年组成的中国护士协会所规定的教材。

另外,1914年6月烟台毓璜顶医院也开办了一所护士学校,招有11名男女学生,计在8年内完成学习课程。1918年该校在中国护士协会注册后,毕业生可领到由中国护士协会颁发的文凭。“护校的训练课程,包括紧张的课堂教学和在监督指导下的病房、手术室、食堂及门诊部的实际训练。护理服务不分昼夜。”<sup>〔2〕</sup>

“随着现代医学和西式医院传入中国,护士职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护士这项职业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有。”<sup>〔3〕</sup>既使在西方,护士做为一种正当职业也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被社会所承认的。不但大多中国人瞧不起这种“伺候人”的工作,就连护士学校的学生也常抱怨工作的艰苦。“但是,对护士的需要是大量的。随着正规医学院的建立,医院教学如果没有护士专业,似乎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sup>〔4〕</sup>面对现实的困难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正是女传教士用亲身的工作经历加之以耐心的说服,才使人们认识到护士不但是令人尊敬的一项职业,也为妇女走上独立工作的道路,扫清了障碍,不少父母要求送他们的女儿入护士训练学校学习。一位权威人士这样评价女传教士创办的护士教育:“在他看来,基督教徒开创护士职业比起介绍现代医学、创办医院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基督教徒妇女树立的榜样,中国的年轻妇女是不会来的。”<sup>〔5〕</sup>

〔1〕 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2〕 阿美德:《抗战前的烟台社会、宗教与教育》,曹立前译,郭大松校,出自阿美德编并自行出版的《图说烟台通志》(A. G. Ahmed: comp, ed, Pictorial Chefoo)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一卷,第一期,第42页。

〔3〕 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5页。

〔4〕 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5页。

〔5〕 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 (四) 著述活动

##### 1. 概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介绍中国情况的各种文字,成为西方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来源。”<sup>〔1〕</sup>在近代山东社会也有一批女传教士致力于著述活动,根据传教活动的需要和本人的兴趣,她们的撰文主要涉及以下领域:为布道活动编写各种宗教书籍和小册子;为教会学校编写教材;编撰某位传教士的传记或个人回忆录;向本国教会的杂志、报刊提供大量与中国、山东有关的报道等。

与布道活动直接相关的著述包括,对《圣经》的翻译,对基督教神学论著的介绍和编写一些相关的诗歌、故事。针对山东妇女为文盲的情况,女传教士注意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还专门编写了适用于普通民众的简易祈祷文。由于教会女学涉及部分西学课程,教材的编写也落在传教士身上,她们编写了简易的算术、地理课本,狄考文夫人还为登州文会馆的学生开设音乐课而编写了《乐法启蒙》。倪维思夫人及其丈夫和梅理士的第一任夫人麦克马斯特(Rose Macmaster Mills)编写了个人传记,还有一本回忆录《我们的在华生活》,是传记类著述中影响较大的。另外,很多女传教士都向本国教会撰写文章,或报告工作情况、提出工作建议,或记述山东的风俗民情、社会问题。1886—1888年间,慕拉蒂将许多题为《来自平度的信》的文章发表在本国差会的杂志和南浸信会的州立报纸上,<sup>〔2〕</sup>向差会及时汇报山东南浸信会的工作情况,提出各种现实问题与差会本部探讨。诸如山东社会的妇女缠足、一夫多妻、弃婴等都曾见于女传教士的文章中,也引起过各自差会的激烈讨论。

1908年,马茂兰夫人与中国朋友袁润甫共同主编《晨星报》,这是一份官话的基督教报纸,每期包括布道训诫、翻译出来的圣歌、基督教会的历史等内容。许多中国牧师和其他读者都致信马茂兰夫人,称赞这份报纸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1911年—1912年间,此份报纸为双周刊,每期发行量约在1500—

〔1〕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5页。

〔2〕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113

1600份,此外还出版发行了官话的《福音故事》及大量的宣传小册和赞美诗<sup>〔1〕</sup>

从女传教士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山东各差会以布道为中心的形形色色的活动,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清末民初的山东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情况及山东官方、民众对教会的态度。“以往我们多以封建官僚、士绅们的奏章、著述笔记、揭贴、告白等为依据,评判外国传教士的来华动机,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各项事业及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作用,实际上很难避免完全不用这些人的眼光和思路去评判。”<sup>〔2〕</sup>通过女传教士的著述,或许有助于更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督教1860—1920年间在山东的历史及其活动概况。尤其是女传教士记载的有关基督教妇女工作和组织的内容,尽管这方面的文章较简短,内容过于粗略,但由于这部分文章非常稀少,因此对客观公正评价女传教士和“了解近代山东城乡妇女的某些动向,”仍具有相当宝贵的价值。并且女传教士所叙述的内容多为她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和亲身经历的事件,因而是较为真实准确的。

女性通常有着极为丰富的感情、细腻的心理体验和敏锐的触角,如果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同一事物,会得出与男性截然相反的结论。女传教士的著述活动相对于男传教士有着自己特有的风格。她们既没有象“中国问题专家”明恩博那样写出《中国文明》、《中国人的性格》等影响西方世界的大部头,也没有如花之安一般著有《儒学汇纂》《中国宗教学导论》等有关汉学的著作,更没有象尉礼贤一样翻译《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经典及名著小说,而是基于工作的需要、本身的文化修养及兴趣,更多的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基督教妇女工作和山东的风土民情。特别是有关山东民众的生活风俗,加之女传教士细腻流畅的叙述,在西方普通民众看来更觉亲切和好奇,从而萌生了赴中国传教的念头。毕竟女传教士对其所在差会的历史恐难详实尽述,对山东的评述也难全面、公正,对部分教会工作和传教士的叙述也难免夸大粉饰,因此对这些内容尚需考订,应辩证对待。

〔1〕 Mr. James McMullan: “The 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 D. Macgillivra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2), Shanghai, P. 352.

〔2〕 慕拉蒂:《山东省南浸信会史略》郭大松、曹立前译,引自译者按,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二卷,第三期,第41页。

山东省基督教女传教士著述作品表 (截止 1907 年) 表三

姓名	所属差会	著述作品
倪维思夫人 (Mrs. Nevius)	美国长老会	1、《倪维思的一生》(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2、《我们的在华生活》(Our Life in China) 3、《基督教义问答》(Catechism of Christian Doctrine) 4、《瑞士男童》(Story of a Swiss Boy) 5、《罗斯·麦克马斯特》(Life of Rose Mills) 6、《坚持神圣的生活》(Perseverance in the Divine Life) 7、《倪维思传》(Memoir of John L. Nevius) 8、《论高利贷》(Treatise on Borrowing) 9、《妇女的四本书》(Woman's Four Books) 10、《论缠足》(Treatise on Foot-Binding) 11、《学习先知》(2卷)(Studies in the Minor Prophets)
狄考文夫人 (Mater, Mrs. C. W.)	同上	1、《围困的日子》(Siege Days)
瓦汀夫人 (Whiting Mrs.)	同上	1、《丢失的手镯》(The Lost Bracelet) 2、《冰与雪的寓言故事》(Parable of the Ice and Snow) 3、《习字贴》(The Copy Book)
J. B. 莫特夫人 (Mateer, Mrs. J. B.)	同上	1、《音乐发声法》(Principles of Vocal Music)
A. H. 莫特夫人 (Mateer, Mrs. Ada Haven)	同上	1、《无人爱我》(Nobody Loves Me) 2、《为个人工作者学习》(Study for Personal Workers) 3、《新生》(Regeneration)
坎普夫人 (Capp, Mrs.)	同上	1、《心算》(Mental Arithmetic)
考格德尔小姐 (Cogdal, Miss.)	同上	1、《算术》(Arithmetic)
法汗姆夫人 (Farnham Mrs.)	同上	1、《赞美诗与音乐》(Hymn, with Music) 2、《尼斯玛的一生》(Life of Neesima) 3、《圣经词典修正》(Bible Dictionary Revised) 4、《主日学校的赞美诗集与音乐》(Sunday School Hymnbook, With Music)
波瑟小姐 (Miss Posey)	同上	1、《地理》(Geography)

续表

姓名	所属差会	著述作品
芬驰夫人 (Fitch, Mrs. G. F)	同上	1、《国王的信使》(Messengers of the Great King) 2、《期待的角落》(Expectation Corners) 3、《聪明人的故事》(Story of the Other Wise Man) 4、《感谢安》(Thanksgiving Ann) 5、《买你自己的樱桃》(Buy Your Own Cherries)
马克提夫人 (Macartee, Mrs.)	同上	1、《旧约全书历史》(Old Testament History)
欧文夫人 (Owen, Mrs.)	美国南 浸信会	1、《猎物者的基督生活》(Stalker's Life of Christ)
高第佩夫人 (Crawford, Mrs.)	福音浸礼会	1、《中国新娘》(Chinese Bride) 2、《圣经教义问答》(A Scriptural Catechism) 3、《教义问答》(A Doctrinal Catechism) 4、《三个少女》(The Three Maidens) 5、《基督概论》(An Epitome of Christianity) 6、《外国食谱》(Foreign Cookery Book)
理查德夫人 (Richard, Mrs. T.)	英国浸礼会	1、《教士列传》(Christian Biographies, 10 vol.) 2、《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 3、《小诗谱》(Tune Book in Chinese Notation) 4、《感颂篇》(Words of Anthems) 5、《耶稣基督宝训》(The Teaching of Jesus Christ in His Own Words) 6、《弥赛亚》(The words of Handel's Messiah)

(资料来源: 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 - 1907, Shanghai, 1907, P. 77, PP. 329 - 331, PP. 391 - 394.)

## 2. 倪维思夫人的著述

在女传教士的著述活动中,倪维思夫人的贡献尤为值得称道,她对著述活动的影响及作用就如同布道活动中的慕拉蒂,无人可以替带。倪维思夫人的著述不但量多质优,且题材广泛,影响深远。倪维思夫人具有较深厚的汉语基础,她用中文编写了多部著作,包括宗教书籍、教课书、传记和关于反缠足、高利贷的辩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 1861—1862 年编写的一本《耶稣教官话问答》。倪维思夫人在其主办的布道班中实验后,于 1863 年印刷出版。此后 50 年中,该书再版多次,华北各差会一直沿用,登州文会馆就将此书做为学校的

教材。有人还将此书誉：“自基督教差会开办以来编写的最有影响的两本小册子之一。”<sup>〔1〕</sup>由此不难看出，在著述活动中，倪维思夫人具备了过人的才能。为了让那些最愚钝的学生也学会祈祷，她编写了一篇适应大众一般程度、最为简易的《简便祷告文》，并亲自在一位愚钝的学生身上实践，效果不错。

为了满足基督教妇女工作的需要，倪维思夫人认为有必要为中国教徒树立学习的范例，于是编写了《罗斯·麦克马斯特》和《瑞士男童》两篇文章。麦克马斯特做为妇女工作的典范，因其有责任心、仁慈的美德而著称。她的遭遇十分悲惨，先后失去了 10 位亲人，而其最爱的小儿子也是一位聋哑儿。文章通介绍麦克马斯特的教育、医疗、救济工作，展现其智慧与同情心，用许多为中国人所遭受的不幸，强调麦克马斯特对教会工作英雄主义般的忠诚，<sup>〔2〕</sup>正是因为她是一位正直善良的教会妇女，死后才会升入天国。而《瑞士男童》讲述的是一位瑞士小男孩的悲惨遭遇。这位小男孩是西方主日学校的学生，13 岁时由于饥荒离开家乡，落入了虐待犯的手中，饱受折磨，最后丧生恶狗之口。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每个人物形象都是凶残、卑微的，但很多女性形象却是坚强、美好的。例如小男孩母亲地他的基督教教导是引导他升入天国的主要因素。可使许多女性读者认识到作为“人”的优越感，使其自我主义获得满足。<sup>〔3〕</sup>倪维思的两部作品结尾相似，即麦克马斯特和瑞士小男孩都安详地升入天国，饶恕了使他们备受折磨的人或事。因此这两篇著作同样教人忍耐、顺从、饶恕，以求死后升入天国，有着让人消极面对社会、不与罪恶抗争、浓厚的宗教色彩。

倪维思维夫人另外两部传记《倪维思的一生》、《我们的在华生活》都是以时间为序，以倪维思夫妇的活动为线索，向读者展开了倪维思夫妇丰富充实的一生。其中涉及他们在山东的传教活动及对山东风土民情的介绍，对于人们研究地方史和民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

〔1〕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76.

〔2〕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78.

〔3〕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78.

## 四、女传教士的活动对近代山东社会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 (一)对社会的贡献

#### 1. 兴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女子教育

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决定了中国妇女极其悲惨的生存状态。“三纲五常”将妇女完全置于男性的统治下,社会到处弥漫着男尊女卑的恶风。“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教条象一块沉重的枷锁,把她们禁锢在愚昧无知的牢笼中。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仅限于上层社会的富贵之家,而这些女孩也不过是以家庭教育的方式向父兄学习,或延师于家里教授《女诫》、《女孝经》等。决大多数在社会、家庭中毫无地位的女性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因而“女学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史上的一个空白点。”<sup>〔1〕</sup>教会女学的发展正好填补了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空白。

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阿尔德塞(Aldersey)在宁波创办第一所女塾,中国教会女子教育从此开始。1862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在登州创办的女童寄宿学校,成为近代山东女学的发端。到1920年山东基督教学校的在校初小、高小、中学女生达到5231人,占学生总数的24%。<sup>〔2〕</sup>山东教会女学不但具备了较完整的普通教育体系,而且还涉及启喑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医学教育等多个门类。其中梅理士夫人的烟台启喑学校与马茂兰夫人的烟台花边学校在全国教会系统中颇具声望。虽然教会女学的毕业生在全省女性中只是凤毛麟角,但教会女学毕竟结束了山东妇女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使挣扎和呻吟在封建礼教下的一部分妇女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冲开了几千年的禁锢。

教会的女子教育在山东是一项起步艰难的事业,女传教士不但要克服社会上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积习,还会遭到来自差会内部甚至是亲人的反对。美国南浸信会的高弟佩夫人就因丈夫的反对被迫放弃教育工作,去协助其丈夫的布道工作。因为有了女传教士虔诚和执着的精神,女学教育才有了继续

〔1〕 陆著:《鸦片战争后教会女塾在中国的兴起》,载《史林》1990年,第4期,第54页。

〔2〕 根据:《中华归主》蔡永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26页表格。

发展的推动力。尽管西方传教士倡导女子教育的初衷是基于在妇女中扩大宗教势力,但它对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有力冲击是不容否认的,并对山东女性在蒙昧中觉醒,追求新知识,实现自身价值,争取解放,有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曾指出:“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往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洒落,而无所粘滞焉。”<sup>〔1〕</sup>

近代山东女性“就是这样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开始接受现代启蒙教育的,教育启女性之心智,去女性身上千年尘垢。”<sup>〔2〕</sup>从1862至1920年期间,在山东教会各级女学里都有女传士活跃的身影,她们提倡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开化山东之民俗,并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相对扩大了近代山东受教育的对象。各国教会也满意女学的发展状况,对女学教育也日渐重视,派往中国的专业教育人才的文化程度也不断提高。教会女学为以后“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为中国的妇女运动培养了最初的人才”,<sup>〔3〕</sup>它的一套办学方针和管理手段为我省以后的教育发展以及办学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部分女校还成为我省自办学校的前身。这些积极影响也都是教会所始料不及的。诚然,教会女校传授的西学知识是“经过教会‘净化’”的近代西方中落后、保守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中国女性对西学全面认识的进程,但教会女学所传授的知识毕竟是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的知识系统,启诱了国人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将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推向了史无前例的变革潮流之中。

## 2. 倡近代山东社会改良新风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最为深重的广大女性往往是社会丑恶现象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改良社会风气,也就是改善了女性的生存环境。教会明令戒食鸦片、禁酒、禁赌、禁嫖,有上述恶习者不得施洗入教。而女传教士工作的受众就是广大受煎熬的同性姐妹,因此在提倡社会新风方面不遗余力。女传教士秉承原始教义中平等、博爱的精神,把福音对女性做为“人”的关怀集中体现出来。

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缠足的野蛮陋习给予了激烈的抨击。她们认为独见

---

〔1〕 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2〕 顾邦文:《近代中国女性与基督教启蒙》,《当代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第26页。

〔3〕 雷波等著:《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于中国的女子缠足是摧残女性身心健康、违背自然的行为。在教会女学校里率先兴起了反缠足运动,并将放足做为女性入学的先决条件而严格执行。在烟台马茂兰夫人的花边学校中,新放足的学生还不能完全适应,马茂兰夫人就耐心地教导学生们怎样按摩来恢复原形。倪维思夫人更成为山东天足会的领导者。在基督教教义中,生命是上帝赐予的,生命一旦形成,就有生的权利。面对近代山东社会颇为盛行的溺婴、弃婴之风,女传教士在旗帜鲜明地予以鞭鞑的同时,还亲自收养这些可怜的婴儿。基督教的婚姻伦理观注重维护夫妻之间牢固的婚姻关系,认为这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并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因此女传教士们坚决反对纳妾、重婚,保护了妇女不受伤害,表达出许多妇女心中敢怒而不敢言的内心渴望。1886年,美国南浸信会的慕拉蒂在平度给本国教会写过一篇有关“一夫多妻”制的文章,将这一制度描述为“令人作呕的污秽行为”,曾引起教会的极大关注。在封建家长制下,中国青年男女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制造了无数婚姻的悲剧。女传教士一般都积极支持女信徒和女校的学生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童养媳等陋习,主张妇女婚姻自主。例如,马茂兰夫妇就支持并帮助花边学校的一位女学生退掉了家庭为其包办的不幸婚姻,并认该女生为义女。这位女学生不但受到马茂兰全家的格外爱护,还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在马茂兰夫人的祝福下,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

此外,为增强山东女性的体质,女传教士还引入了西方文化中的体育课目,以健全体魄。如同善会女校为学生开设体操课;烟台花边学校由马茂兰夫人的女儿兼教体育课,自制了瓶状棒、哑铃、竹杖、铁圈子等简易体育用具,很多女学生都很乐意参加体育班,因人数众多,只好分班进行。

“中国社会数千年旧习积重,难有稍许改变,”<sup>〔1〕</sup>且女传教士所变革的旧习俗多为与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的方面,因而她们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使广大山东妇女摆脱封建压迫。但客观上多少支持了山东妇女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也给近代山东社会吹进了一股改良新风,使沉寂的死水泛起了微澜。

## (二)历史局限性

基督教本身归根到底是男性主体社会的宗教,因此近代西方基督教女传

---

〔1〕 孙一江:《十字架与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页。

教士不可能获得在教会中与男性绝对平等的权利。否则她们也不会远赴山东寻找与男性平等工作的机会。“妇女要重新完全、彻底的找回女权与平等,这是需要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及社会演化的漫长过程才能实现的。”<sup>〔1〕</sup>所以;女传教士之提倡女性的解放从开始就受到自身教义和人类历史进程的局限,更何况它对近代山东女性的启蒙和解放了。

首先,表现为基督教女学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在 1893 年,第一次山东传教士大会上,狄乐播(R. M. Mateer)将兴办女学的原因阐释的明白无误:“第一,让女学培训未来的母亲;第二,女学要为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培养合格的妻子;第三,女校要为教会的妇女工作培养师资力量。”<sup>〔2〕</sup>而教会女校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至少有三件事是必做的:“其一,为了有足够长的时间给外国教师以影响,塑造顺从基督的品格,女孩入学的年龄越小越好;其二,女校的学生要有一技之长,例如烹饪、刺绣、缝纫等;其三,她们注定要过基督徒式的生活。”<sup>〔3〕</sup>在如此鲜明的宗教目的下,教会为女学制定的政策方针,也得到了女传教士们的忠实履行。进入教会女学的山东女性完全被置于教会培养所需人才的模式下,假以女传教士之手被培训成一批批土生土长的女传教士、合格的中国传教士的妻子。一句话,在中国妇女中培养和平征服中国的工具。

教会女学虽然开设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课程,但囿于办学目的的局限,宗教课程就成为其教学的中心。宗教科目不仅繁多,而且所占学时很多,除《圣经》外,有关新、旧约圣经的历史和道理都详尽地教给学生们。除正式上课外,每日的早祷、晚祷更是必不可少。教会女学用一切手段向学生灌输宗教知识,实施精神渗透,他们认为“一个虔诚的母亲对培养孩子仁慈、顺从的基督的品格,会有亲切、强烈和持续的影响。”<sup>〔4〕</sup>如果母亲受到教会学校的教育,对下一代的成长,在思想观念上必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今天教会女校的学

〔1〕 顾邦文:《近代中国女性与基督教启蒙》,《当代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第28页。

〔2〕 R. M. Mateer: “Primary Rducation for Girls,” Records of the First Shantung Missionary Conferece at Ching - Chow fu, 1893,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PP. 72 - 74.

〔3〕 R. M. Mateer: “Primary Rducation for Girls,” Records of the First Shantung Missionary Conferece at Ching - Chow fu, 1893,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 Press, 1894, PP. 75 - 76.

〔4〕 R. M. Mateer: “Primary Rducation for Girls,” Records of the First Shantung Missionary Conferece at Ching - Chow fu, 1893,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P. 72.

生就是明天孩子的母亲,因此教会将创办女校放在与男子教会学校同样重要的地位。

其次,在倡导女性解放上的局限性。女传教士们为保守的福音派思想所局限,并不追求男女真正的平等,不主张妇女参政议政,也不会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传统,至多是让中国妇女走出家庭,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更多的女传教士主张,妇女要“以家庭为中心,负起对子女的道德与文化教育,”<sup>〔1〕</sup>成为一名贤妻良母。这与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亦重“贤妻良母”,且以三从四德为贤,可谓不谋而合。为此,教会女校内除宗教课外,还专门开设所谓家政课程,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贤妻良母。就连美国长老会的罗嘉礼夫人(C. K. Roys)也说:“山东总体上说保守主义占绝对优势,我们决不指望在这里发现多少令人瞩目的妇女解放事例。”<sup>〔2〕</sup>

## 五、女传教士在山东活动的特点

### (一)女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表现出对山东、山东人民态度的两重性。

一方面,大多数女传教士对山东的感情要胜于男性传教士,山东穷苦民众尤其是广大妇女的悲惨境遇激起她们心中的良知和同情心,在工作中对山东人民倾注了深切的关爱,也时刻提醒自己这里正是发挥基督教博爱与奉献精神的地方。不少女传教士在山东长期生活,与山东人民产生了较深厚的感情,尤其在山东妇女的朝夕相处中,发现了她们身上的闪光点:“即使最具偏见的人也能从她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人们经常看到孩子般的朴实及耶稣评价远在教育之上的信仰这类美好的范例。见到这些刚从异教黑暗中走出来的妇女对祈祷的理解实际上要比我们好,使我们这些年来即了解祈祷潜力的人时常感到汗颜。以她们的朴实方式将祈祷纳入所有生活经历之中,是我们大

---

〔1〕 段琦:《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及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第39页。

〔2〕 罗嘉礼夫人:《基督教1914年以前在山东的妇女工作概述》,郭大松、纪丕霞译,出自季理斐编《中国差会年鉴》(1914),上海广学会出版。(D. Macgillivra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8),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二卷,第四期,第63页。

家都要学习做的。”〔1〕

很多女传教士随着对山东感情的加深,视山东为其第二故乡。她们在饮食、服饰、语言等方面已融入山东的风俗习惯之中,有的人返回本国后反倒不适应了,最后又重返山东,终老于此。在山东生活了39年的慕拉蒂,已经完全磨灭了外国传教士身上的文化沙文主义印记,对中国文明做出了最深入、客观的评判:“我们应当记住,中国不是一个只惊叹西方文明的弱小、野蛮民族。相反,在我们的祖先还没有脱离野蛮状态之时,中国已拥有了令人尊敬的文明。”〔2〕当慕拉蒂发自内心的表达出“我真诚地相信我热爱中国。尽管她对我还很陌生,但我还是最热爱中国人民”〔3〕这份感情时,我想不会有人去置疑她的虚假。

还有不少女传教士将对山东人民的爱默默付诸于实际的工作当中。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夫人自己没有孩子,便将全部的母爱无私的奉献给她的学生们。她不但负责学生的课业,更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学生的衣服脏了,由她来洗;学生的衣服破了,由她来缝补;学生病了,由她端水送药;天气潮湿时,她督促学生们晒被褥。因此,狄考文夫人也得到了学生无比的爱戴,在她过生日时,学生们送其“育英寿母”的匾额,这也是对狄考文夫人最高的褒奖。传教士狄乐播这样评价到:“她的个性光彩照人,既有机智的幽默又有胸怀大众的献身精神。”〔4〕马茂兰夫人在烟台创办一所孤儿院,收容市内的孤儿、弃婴、甚至年老无依的老人。每到马茂兰夫人的生日时,她就招待孤儿院的孩子和花边学校的学生一同去效外游戏、野餐。圣诞节时,她邀请所有的孩子参加她的家庭圣诞晚会,孩子们在一起玩闹、领取圣诞礼物,享受着被人关爱的温暖。马茂兰的女儿这样评价母亲:“她一生从事极丰富、益于他人的工作,中国人以‘母亲’称之,道之。她爱人不息,牺牲自己,对于‘爱邻舍’

〔1〕 罗嘉礼夫人:《基督教1914年以前在山东的妇女工作概述》,郭大松、经丕霞译,出自季理斐编《中国差会年鉴》(1914),上海广学会出版(D. Macgillivra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8),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二卷,第四期,第68页。

〔2〕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120.

〔3〕 凯瑟琳·B·阿伦,《慕拉蒂新传》,第119页,见陶飞亚:《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第107页

〔4〕 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的诚命和原则持守到底,凡认识她的人,无不敬爱她。”<sup>〔1〕</sup>而当时的烟台民众也无人不晓“东山马师娘”的善行和美德。道德贞女士亲手创建滕县的孤儿院,并掌管滕县华北医院的全部工作,“对待病人尤为热忱和关心。幸存至今的老病人每当提起道德贞,赞不绝口。”<sup>〔2〕</sup>1911年辛亥革命时,黄县遭围困,慕拉蒂没有与其他传教士撤离黄县,而和其他三位传教士冒险驻守莱州医院,为难民服务,“救济受兵祸的伤众。”<sup>〔3〕</sup>

女传教士们如果没有对山东、山东人民真切的热爱,就不会有如此的真情流露,她们在近代山东社会的历史上应该有更令人尊敬的地位。

另一方面,一部分女传教士身上固有的文化沙文主义,产生了认同上的优越感,她们认为山东是贫穷、落后、迷信的省份;山东人民是愚昧、无知、道德沦丧的群体。当一些女传教士面临艰苦的现实生活时,她们的热情消失了,抱怨环境的肮脏,鄙视民众的无知,无形中这部分人脱离了广大山东人民,尤其是广大妇女的信赖,必然她们从事的传教活动就收获甚微。

一些女传教士顽固的拒绝适应中国的文化和山东的民情,她们坚持穿西式的服装,家居摆设完全依照西方的风格,就连刀叉、盘子也从本国带来。这种做法无疑也拉开了与山东民众之间的距离。虽然女传教士为山东创办了不少女校,但她们自己的孩子是不送入这类学校的,而是送入内地会在烟台专为外国传教士子女办的学校,接受正统西方教育,以免受到中国文化的“不良影响”。

## (二)组织了相对完善的妇女工作

基督教女传教士在近代山东社会中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自己的同性姐妹身上,提出“妇女工作为妇女”的口号,其所从事的妇女工作是各差会传教活动的独立且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争取广大女教徒,扩大耶稣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高等佩夫人曾将早期妇女工作划分为以下五种:寄宿学校与日校的工作、挨家挨户走访、教导来访者并帮助培训基督徒、女传教士定期参加中

〔1〕 穆马快乐:《我的一生》(China Born)、曲拯民译,(台湾)《山东文献》,第十一卷,第二期,第127页。

〔2〕 《山东省卫生志资料》第4辑,第77页,转引自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4页。

〔3〕 《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1836-1936》美华浸全书局印刷,1936年,第149页。

国人组织的礼拜仪式及著述工作。<sup>〔1〕</sup>有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教会妇女工作是女权运动，但它的理论基础和定位是福音布道，主要的目标是拯救中国妇女的灵魂。”<sup>〔2〕</sup>这一点从高等佩夫人所划分的五种工作便可以看出，内容较单一，完全围绕布道工作而服务。早期的妇女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无序的方式进行的。

通过女传教士们的不懈努力，妇女工作逐步深化和系统化，1914年时，近代山东基督教妇女工作已包括除布道、教育、著述之外的医疗、实业、社会服务、慈善事业等种类。山东还有令女传教士倍感自豪的组织完善的“妇女大会。”大约在1904年，有三百多名妇女，代表各布道分站在潍县聚会。“1913年有三次妇女大会，一次在青州，一次在济宁，有一百人参加，另一次在潍县，有四百五十人参加。这些参加大会的妇女中，有二十六人要走二十七英里多的路，其中九名已七十多岁年纪。”<sup>〔3〕</sup>在妇女大会中要学习以下科目：“现用福音真理”、“正常夫妻关系”、“妇女教育”、“妇女在家庭宗教中的作用”、“照料子女”以及“放足”等。这种妇女大会实际是集中学习包括实用基督数(Practical Christianity)有关的课程和探讨与妇女密切相关的问题，加强各差会之间女传教士的联系，增进了解，共同促进妇女工作的稳步发展。

女传教士既是各差会妇女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这一工作的勇于实践者，不仅因为工作对象为她们的同性姐妹，还因为她们觉得在差会中“男性是专进行理论假设的家伙。”<sup>〔4〕</sup>因此女传教士所从事的活动是差会中最繁杂、又是最基础的，为其整个教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将整个差会工作比喻成一个金字塔，或许女传教士达不到令人羡慕的最高峰的位置，但毫无疑问，女传教士的妇女工作构成了金字塔牢固的根基。

---

〔1〕 Mrs. T. P. Crawford: "Woman's Work for Woma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1878, PP. 147-151.

〔2〕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86.

〔3〕 罗嘉礼夫人：《基督教1914年以前在山东的妇女工作概述》，郭大松、纪丕霞译，出自季理斐编《中国差会年鉴》(1914)，上海广学会出版。(D. Macgillivra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8),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载(台湾)《山东文献》第二十二卷，第四期，第67页。

〔4〕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c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86.

此外,有的女传教士因其在山东近代的这段生活历史,而给她带来一生荣耀。美国南浸信会的慕拉蒂由于在山东这段英雄般的传教历史,使她在美国南浸信会信徒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几乎成了该会崇拜的偶像。仅1988年就有千名美国基督徒到山东蓬莱等地寻访慕拉蒂的故迹,登州对美国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城市。而每年圣诞节以慕拉蒂名义获得的募捐数以千计,至1980年已达4亿5千万美元。<sup>[1]</sup>而有关她的文章,从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一出再出,其中包括威廉·蒙的《慕拉蒂家庭的历史》,1920年出版;马奇·布拉克的《我们自己的慕拉蒂》,1970年出版;凯瑟琳·阿伦的《慕拉蒂新传》,1980年出版及其多部作品。1958至1964年间,美国有三部有关慕拉蒂的短剧被搬上了舞台。之后,由国外布道会赞助将慕拉蒂在中国工作的情形拍成了电影,名为《慕拉蒂的故事》<sup>[2]</sup>美国民众从这些多样的文艺形式中,了解、认识了山东,无形中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卫灵女校的第三任校长浦爱德女士1923年离开山东后,著有《蓬莱宁老太太的自传》,“介绍1860年登州开埠后宁老太太大半世纪中亲历的事物,举凡山川人物,乡里传说,民间习俗,甲午战争下的人民苦况等,无不披沥尽述。”<sup>[3]</sup>本书的英文原本由耶鲁大学出版发行,风靡全美,浦爱德也因此书一跃成为美国文坛的名人。基督教女传教不但撒播耶稣的宏爱,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

[1] 陶飞亚:《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载《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第107页。

[2] Irv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129.

[3] 曲拯民:《美国南浸信会在烟台创卫灵女校,焕文男校》,载(台湾)《山东文献》,第十五卷,第四期,第82页。

## 参 考 文 献

### 一、中文资料

- ①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②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6辑,1985年;19辑,1986年。
- ③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集粹》(教育卷)、(民族宗教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 ④(台湾)《山东文献》社编:《山东文献》第5卷、8—9卷、11卷、15卷、17—25卷。
- ⑤《山东省宗教志资料选编》第1辑,1987年;第2辑,1989年;
- ⑥《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5年第1期;1986年第4期;1988年第1期。
- ⑦《外国教育参考资料》1990年2—4期;1991年第1期。
- ⑧《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1936—1936》,美华浸会书局印刷,1936年。
- ⑨《中华归主》,蔡永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⑩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
- ⑪杨真:《基督教史纲》,三联书店,1979年。
- ⑫(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 ⑬黄兆群《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⑭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⑮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⑯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⑰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 ⑱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⑲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
- ⑳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②①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②②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
- ②③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 ②④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②⑤雷良波等著:《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
- ②⑥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矩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 ②⑦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0年。
- ②⑧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北,1970年。
- ②⑨杨森富编著:《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 ③⑩孙一江:《十字架与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 ③⑪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年。
- ③⑫邵正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正中书局印行,1987年。
- ③⑬(美)迈克·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王扬子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 ③⑭J·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上、下)杨国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 ③⑮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92年。
- ③⑯李小江等编:《性别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
- ③⑰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
- ③⑱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③⑲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上、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
- ④⑩青岛基督教协会编:《基督教在青岛,1873—1980》,(内部影印本)
- ④⑪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 ④⑫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二、外文资料

- ① Armstrong, Alexander. *Shantung*. Printed at the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

② *China Mission Hand - Book*. First Issu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③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1922.

④ Forsyth, R. C.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1912.

⑤ Heeren, John J. *On the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New York, 1940.

⑥ Hunter, Jane.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 American Woman Missionaries in Turn - of - the - 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⑦ Hyatt, Irvin T. '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⑧ Latourette, K.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⑨ Macgillivray, D, ed. *A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 - 1907*. Shanghai, 1907.

⑩ Macgillivray, D,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⑪ Nevius, Helen S. C.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e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New York, 1895.

⑫ Nevius, Helen S. C. *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1869.

⑬ *North China Woman's Conference*. M. E. Church, 1911 - 1915.

⑭ *Records of China Centu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1907.

⑮ *Records of the First Shantung Missionary Conference at Ching - Chou fu*, 1893. Shanghai, 1894.

⑯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 - 24, 1877*. Shanghai, 1878.

⑰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 - 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⑱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 Shanghai , May 6 – 9 , 1896 . third Triennial

① *Records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 Shanghai , May 17 – 20 , 1899 .*

② *Records of the Fifth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 Shanghai , May 17 – 20 , 1905 .*

③ Reed , James .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 1911 – 1915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④ Valentin , Robe H . *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s 1880 – 1920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 .

⑤ Vary , Paul A .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 – 1952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58 .

⑥ *Woman ' s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North China , Peking 9 . 22 – 26 , 1896 .* The Tientsin Press , 1896 .

⑦ *Woman ' s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North China , Peking 10 . 5 – 9 , 1899 .* The Tientsin Press .

⑧ *Woman ' s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North china . 1908 .*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 Shanghai and Fuchow China

## 后 记

本文从选题到定稿,历时一年有余,在资料搜集、纲目设计、论文写作及修改过程中,我的导师李宏生教授始终惠予我极大的热情鼓励和耐心指导。而先生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严谨的学风,将是我终生学习的目标。在论文修改过程中,孙占元教授给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开拓了思路,提高了境界。同时,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得到了郭大松教授和田海林博士的谆谆教导,不胜感激,在此谨向以上师长表示了我衷心的感谢和无比的尊敬。

此外,在资料搜集过程中,还得到了山东大学陶飞亚先生、刘天路先生、苏位智先生和中国社科院朱东安先生的热心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学生:朱小俐

2001年4月29日